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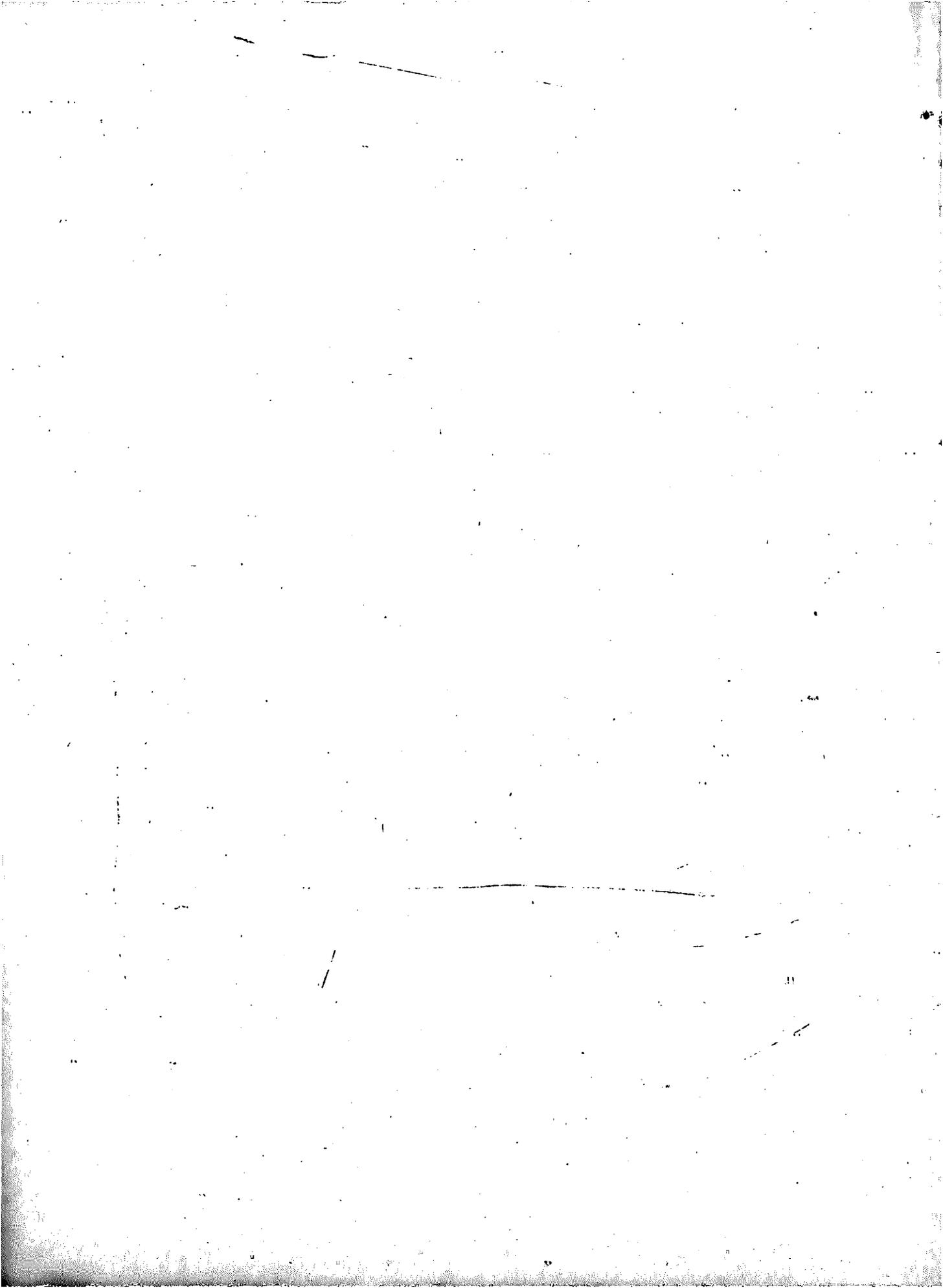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
与
批判

7

1976

柳岩泉
八·八·七六



毛主席语录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目 录

在斗争中建设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3)

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忻启明 (6)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的方天戟 (9)

“白花谢了开红花”
——老根据地访问记之一史 锋 (13)

“为了革命自带粮”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张东霞 (19)

“栽树不歇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冯海翔 (20)

发扬革命传统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 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 康 立 (22)
- 《二十条》的要害在哪里? 延 风 (26)
- 驳“伤害论” 新 戈 (29)
- 革命与资本
- 杂 文 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 戚承楼 (32)
- 食虫类·猿猴·走资派 陈熙春 (35)
- 商标学研究一得 戴子英 周献明 (36)
- 十月革命后阶级关系问题上的一场论战 石 仑 (38)

经济问题研究

社会主义农业前进的新步伐

- 记彭赵大队的农业专业队 贺苗壮 (42)
- 上海造船工业十年 本刊通讯员 本刊记者 (48)
- 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靳柏年 (53)
- 读者来信：关于茶盘生产的一场争论说明了什么?
..... 上海工业玻璃五厂党支部 (56)

文化战线

- 爱国词人辛弃疾 高义龙 (58)
- 童工的血泪
- 读苏修短篇小说《第一次领工资》有感 周勇圆 (67)
- 附：第一次领工资 (70)
- 怎样更好地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
- 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纪要 (76)

七月四日付印
七月十四日出版

在斗争中建设党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我们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五周年。

我们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率领亿万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更富有战斗力，正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但是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纲领，还需要全党进行长期的奋斗。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纲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党的最终目的，才能解决好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建设问题。

社会主义时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极其重要。毛主席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在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个批示中，曾经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毛主席又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毛主席还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毛主席的这一批示以及文化大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的阶级本质，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从中接受深刻的教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只有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清醒地看到走资派是危害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力量，不断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才能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样，我们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搞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同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把反对帝修反的斗争进行到底，为全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以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工农兵心连心，坚决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许多优秀党员，站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率领广大群众英勇战斗，起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是，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党员的一部分，

有的已经变了，有的正在变，有的如果不警惕，也会变。那些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党和群众的帮助，多数认识了错误，吸取了教训，在革命道路上继续前进。但也有象邓小平那样的人，坚持错误，成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们的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使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新的发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蚀，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努力做到从思想上完全入党。

当前，我们要集中火力批邓，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站在斗争的前列，经受锻炼和考验，要联系各条战线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积极带领群众同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要主动地在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我们的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程，有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广大党员，不愧为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不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中流砥柱。我们敢于把党内资产阶级揭露出来，正说明我们党有力量、有信心、有能力战胜党内资产阶级，从而彻底战胜整个资产阶级。党内出现走资派，无损于我们党的光辉。出了刘少奇一伙，昆仑山不是没有被推倒吗！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庐山不是没有被炸平吗！今天，出了邓小平，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天安门广场闹事，他们的阴谋被粉碎了，天安门更加雄伟壮丽。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正如毛主席所断言：“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在斗争中加强党的建设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析 启 明

今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我们满怀革命豪情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五周年。

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邓小平妄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必须看到，前进道路上的斗争并没有止息。我们要带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而奋斗，就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思想政治路线对了头，革命就胜利、就前进；思想政治路线不对头，革命就要遭到挫折、遭到失败。正因如此，在历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总是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教导全党要学习马列主义，从思想理论方面打败错误路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深刻地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各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在几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都反复教导全党要把批修和

学习马列紧密结合起来，要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经验证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是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的根本保证。为什么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要搞垮我们党都不能成功呢？张国焘要分裂党，结果逃跑时连警卫员都不跟他走。林彪拉山头、结死党，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到头来只能和几个死党狼狈出逃，连一个班、一个连也“调动”不了、“指挥”不了。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一手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也是落得个孤家寡人、彻底破产的下场。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尽管机会主义头子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是人心、党心、党员之心，总是要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不断前进的。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仅是革命胜利的保证，而且是由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所决定的。搞社会主义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在党内形成一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就是以修正主义路线为他们的共同基础的。党内走资派之所以成为整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核心力量，也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一部分权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因此，我们同走资派斗，最要紧的是解决路线问题，用马克思主义路线战胜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只有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关系发生的新变化，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搞清楚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把思想政治路线搞正确，才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战斗作用，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进行坚决的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修正主义，不仅要在全党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而且要让广大群众都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评论《水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都是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路线斗争。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那样害怕评论《水浒》，那样拼命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因为他们懂得，如果广大群众和

群众一旦掌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就容易识破他们的修正主义面目,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就难以得逞。走资派越是害怕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我们就越是要对群众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在当前,尤其要发动群众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入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能不能这样做,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的大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着这方面的深刻教训。苏联过去曾处理过一些搞修正主义的人,如一九五〇年就清洗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这个党内很大的走资派。但是由于对沃兹涅先斯基之流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发动全党、全国人民加以批判,因此赫鲁晓夫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就轻而易举地为那些走资派翻了案,改变了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改变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今天,我们如果不着重从思想政治路线上把邓小平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那末,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搞资本主义复辟就很容易。

毛主席指出:“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搞好组织建设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而且也只有首先抓好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才能有正确的方向。如果不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组织建设离开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的统帅和指导,那就必然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实际上,离开一定的思想政治路线的单纯组织建设从来是不存在的。邓小平不是声称“整顿领导班子”是什么“核心问题”吗?其实,他是要在“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思想政治路线下,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把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能够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朝气蓬勃的领导班子整掉,建立能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班子,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性质,复辟资本主义。

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深入发展,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正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在社会主义大道上阔步前进。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尖锐复杂的斗争,党内还会不断出现资产阶级,出现邓小平一类的人物。但是不管道路是怎样的曲折,斗争是怎样的尖锐复杂,只要我们的党坚持在斗争中加强建设,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就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战胜党内外资产阶级,战胜修正主义,完成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政党 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的

——学习《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一点体会

方 天 戟

近一个世纪以前，正当法国和德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出现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时刻，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一封信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恩格斯的这段重要论述，精辟地总结了自己和马克思几十年来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斗争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党内斗争应有的正确态度。今天，在欢庆党诞生五十五周年，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重温恩格斯的这段话，感到格外亲切和深刻。

为什么无产阶级政党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发展的？我们只有按照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才能作出正确的理解和回答。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无产阶级政党，同宇宙间的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就是针对当时法国工人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来的。由于马隆、布鲁斯等机会主义者搞阴谋、耍诡计，背叛了党的纲领，法国工人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终于分道扬镳，宣告决裂。法国工人党的这一历史说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有矛盾、有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矛盾就有斗争，有斗争才能发展。“任何工人政党，只有在内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这是符合一般辩证发展规律的。”（《恩格斯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10月20日）》）在一国范围是这样，在国际范围也是这样。第一国际成立前后，马克思、恩格斯就同形形色色的冒牌社会主义斗，同蒲鲁东主义斗，同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斗，同英国工联主义斗，斗争的结果，终于使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德国工人运动也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壮大起来的。在马克思、恩格斯

指导下，德国工人阶级同拉萨尔、杜林等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而使德国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建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拉萨尔反动的“哥达纲领”，就没有马克思的光辉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没有杜林这个政治骗子跳出来向马克思主义全面进攻，也就没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同样，没有同第二国际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的斗争，也就不会产生列宁主义。在我们党内，也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正是在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我们党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巩固、发展、壮大。“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一百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党五十五年的历史，不是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吗？

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究竟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还是按照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去看？党内斗争的实质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历来是截然相反的。一切修正主义者，或者为了逃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或者为了掩盖他们的修正主义面目，或者为了混淆视听，把水搅浑，总是极力抹杀党内斗争的阶级实质。把党内斗争歪曲成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就恶毒诬蔑我们党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是“故意去寻找‘斗争对象’（党内同志）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来开展斗争，牺牲与打击这一个或这几个同志，‘杀鸡给狗看’”。林彪反党集团在《“571工程”纪要》中，也把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说成是“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斗争。今天，邓小平一伙为了替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招魂，为自己的修正主义罪行翻案，完全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对刘、林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批判，歪曲成为“这一派”同“那一派”、“新干部”同“老干部”的斗争。但是，无数斗争事实证明，那些修正主义头子之所以要拚命歪曲党内斗争的实质，正是为了混淆阶级阵线，松懈革命人民的斗志，以便他们肆无忌惮地篡改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驳斥那种把法国工人党内的斗争“理解为个人之间的分歧”的错误观点时，严正指出：“争论的问题完全是原则性的：是应当把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进行呢，还是应当象机会主义者（翻译成社会主义者的语言就是：可能派）那样，只要能获得更多的选票和更多的‘支持者’，就可以把运动的阶级性和纲领都丢开不管？马隆和布鲁斯赞成后一种做法，从而牺牲了运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并且使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恩格斯还指出，如果分裂不可避免，“那末它决不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当成为私人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私人争吵的东西）”。恩格斯的这些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党内斗争，识破邓小平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多么重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认为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并不是个人的交锋，就因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的。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尽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身上披着共

产党的外衣，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但实际上他们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向无产阶级作斗争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机会主义者形式上属于工人政党这一情况，丝毫也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第二国际的破产》）当年法国工人党内的马隆、布罗斯是如此，今天我们党内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也是如此。他们要推行的事实上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而是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路线。所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重要方面。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他们为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一生，“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然而，这种斗争在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前后，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虽然属于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是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司令部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党内资产阶级，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还只是社会上资产阶级的附庸、尾巴、小伙计。因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首先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后，情形就不同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阐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内走资派同工人、农民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资产阶级司令部就在党内。这种变化，决不是偶然的。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成了执政党。那些修正主义头子又都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当权派，象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就都掌握着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因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工具，搞起复辟来，比党外资产阶级容易得多、厉害得多。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可以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大搞资本主义，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可以打出各种所谓“真正的马列主义”的旗号，暂时蒙蔽和欺骗一部分不明真相、觉悟不高的人，跟着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走。总之，他们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挂帅人物。由他们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确实比那些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亲自出马要好得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解放以来我国历次重大的阶级斗争往往都表现为党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了解社会主义时期党内斗争的这个特点，我们就容易克服那些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和对路线斗争感到忧虑、烦恼的思想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就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党内资产

阶级司令部过去有，将来还会有。“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因此，对于同走资派的斗争，我们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在当前，特别要按照毛主席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的教导，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最后战胜资产阶级。

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但胜利总是属于革命的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对斗争从来都是抱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把斗争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因为我们懂得辩证法，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不论哪个时代，革命的人民群众总是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伟大的斗争，必将产生伟大的领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后，第二国际的那些党，除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几乎全部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篡夺了列宁、斯大林的党，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并在全世界掀起一股修正主义的反动逆流。在这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率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同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革命一代接一代，擎旗自有后来人。正如列宁曾经满怀热情所指出的：“我们比我们的父辈奋斗得好。我们的子女将比我们奋斗得更好，他们一定会胜利。”（《工人阶级和新马尔萨斯主义》）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要经历多少反复，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一切倒行逆施的修正主义小丑，可能得势于一时，到头来只能身败名裂，自取灭亡。“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新生必然战胜腐朽，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必然战胜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这是历史的规律。

一百多年前，当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旧世界宣战时，就豪迈地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这是资产阶级的丧钟，是无产阶级的凯歌。一百多年来，旧世界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展望天地翻覆的大好形势，我们充满革命的豪情，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革命，坚持斗争，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我们的目的定能够达到，鲜红的太阳必将照遍全球，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白花谢了开红花”

——老根据地访问记之一

史 锋

我曾经见到过这样一张照片。

这是一幅记录了一位井冈山老人同敌人肉搏场景的壮烈图画。老人有五十岁了吧，白发被山风吹得有些散乱，两手紧握一杆梭镖，愤怒地刺向面前的两名头戴大盖帽的反革命士兵。他们虽然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但在老人的梭镖面前，狼狈地朝后倒去。

这位老人，是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井冈山革命战士的代表，他唱出了一首震撼山岳的无产阶级正气歌！在今天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特别需要学习井冈山斗争年代的这种革命精神。

怀着这样的心情，正当四月春深的时候，我访问了井冈山。

更知井冈杜鹃红

提到井冈山，总要联想到杜鹃花。诗人们歌唱井冈山，也总要热情地唱到杜鹃花：

“都说井冈春色好，哪是春光最美时？漫山杜鹃笑依依，笑随风雨翩翩飞。”

“天下花千种，井冈杜鹃最鲜红。多少友人访井冈，珍藏花种当火种。”

从南昌坐上汽车，先是沿着滔滔赣江长驱直进，后来又一头拐进了崇山峻岭，走了十二小时，汽车在傍晚费力地爬上了一座山头。从山顶上朝下一看，远远的山谷里，出现了一座现代化的城市。车上有人高兴地叫道：“茨坪到了！”

茨坪是井冈山的中心，五大哨口拱卫着它，大小五井烘托着它，象一颗明珠镶嵌在罗霄山脉中段。自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伟大领袖毛主席率领队伍上了井冈山，荒僻的山村沸腾起来，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展生产，搞得十分闹猛。当时有一首民谣说：“行州府，茨坪县，大小五井金銮殿。”行州、茨坪和大小五井，都只不过是山中的村落，民谣称它们为“州”、“县”和“金銮殿”，是反映了它们那时候的繁荣情景。

现在按理正是杜鹃花盛开的季节。可这里除了高大的树木、翠绿的竹枝、漫山茎叶带红的野草外，竟没有一点杜鹃花的讯息。问老倭，回答说这里山高水寒，杜鹃花开得晚，还得过半个月以后，桐花谢时，杜鹃花也就开了。

杜鹃花虽没见到，但在参观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时，却听到了一个关于杜鹃花的故事。

那天，我要求博物馆的老盛同志介绍照片上那场斗争的历史背景。老盛同志说，那场斗争，发生在一九二九年一月。当时，蒋介石出动了湘、赣两省敌人约二十个团，分四路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会剿”。毛主席早就预见到敌人的“会剿”将要到来，在两个月前就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周密准备，加固五大哨口，建立红军医院，运粮食上山储备。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毛主席满怀信心地说：“现在正从宁冈搬运粮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给养，敌人是打不进来的。”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发展革命形势，毛主席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率领红四军去开辟赣南闽西根据地，把星星之火燃向全国。毛主席下山前，对坚守井冈山根据地作了周到的部署，指示彭德怀率领红五军守住井冈山。但彭德怀却被敌人表面上的来势汹汹所吓倒，不肯留下守山。经过毛主席在柏露会议、下庄会议上的反复说服教育，并将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下协同守山，彭德怀才勉强答应留下。从一月二十四日起，敌人开始攻山，井冈山军民奋起反击，打响了根据地保卫战。赤卫队、暴动队手执梭镖、马刀，协同红军英勇杀敌。那张照片，就是当时留下的见证。

我很想知道照片上那位老人是谁。老盛说，井冈山方圆五百里，包括了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茶陵、酃县等六个县。地方那么大，人那么多，犹如在茫茫大海中去找根针，找了很久，一直不能断定照片上这位老人是谁。后来我们想，在井冈山斗争中涌现出来的这样的老人何止成千上万，又何必非认定一个不可？所以也就没有再找下去了。

老盛的话，使我的视野从一张照片拓展到了井冈山斗争的宽阔画面。是啊，伟大的井冈山的斗争，在暮云沉沉的旧中国打响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炮，产生了同反革命复辟势力作殊死斗争的无数英雄。

接着，我听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敌人占领了茨坪和大小五井后，群众都上了山。山上积了一尺多厚的雪，大家宿在树洞里、石崖下，又冷又饿。敌人上山搜索，满山里喊叫：“下来吧，下来给饭吃。”但井冈山的群众没有一个下山投降的。荆竹山上有一对老夫妻，几天没一粒粮食下肚，夜里，满身披着大雪，倚在树上，双双牺牲了。他们至死不屈服，死后依然坚强地站着。几个月后，把敌人打退时，正是春天。人们找到他们牺牲的大树边，发现那里开出了一簇鲜艳的杜鹃花。

听着这个故事，眼前在展览馆里展出的红军的红旗、赤卫队马刀柄上的红穗、少年先锋队的红袖章、鲜血染红了的革命传单，连同大厅里所有红色的幕帷，仿佛都化作了一片铺天盖地的杜鹃花，红艳艳，光灿灿——山中的杜鹃花虽还没开放，心中的杜鹃花却盛开了！

离开展览馆时，我心中充满着革命的激情，不由得反复吟咏着：

“来到井冈山，更知杜鹃红。”

风云变生黄洋界

“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凡是来到井冈山的，没有一个不怀着急切地登上黄洋界的心情。

我们坐车沿着蜿蜒的山道盘旋而上，朵朵白云不时地悄悄溜进车厢来。到达黄洋界哨口，临高一望，千峰万岭，尽收眼底，好一派云横九派的气势呵！

千峰万岭一线连，黄洋界就是“线”上的一把大锁。它是从湘东和赣北进入井冈山的重要通道。一九二八年八月，红军曾在这里进行了有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以不足一个营的兵力，击退了湘赣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毛主席闻讯，兴奋地写下了千古留传的名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我沿着当年的旧工事走去，处处都可看到那激烈战斗留下的痕迹。走了半天，有些累了，就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歇息，沉浸在遐思之中。咦，怎么有人在我身边坐下来了。一看，两个可爱的红小兵，一左一右，把我夹在中间。

“叔叔，第一次来吗？”左边的孩子问。

“是第一次。你们也是？”

左边的那个孩子张开了两只小手，又缩回了两个手指，那调皮的眼神在对我说：“八次了。”

右边那个孩子说话了：“昨天老师给我们出了个题目：黄洋界上的反复辟斗争。”

左边那个孩子紧接上：“我们特意为这个题目来的。叔叔，这山头险吗？”

“险。”

“这山头能守得住吗？”

嗨，看架势是在考我了。怎么说呢？一九二八年的黄洋界保卫战，打得很漂亮。一九二九年，彭德怀却把黄洋界丢了。我正想着如何回答，孩子又问了：

“为什么同一座山头，有时守住，有时又守不住呢？”这一下，可真把我给问住了。他们见我半晌没有回答，就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开了。

让这两个可爱的孩子去继续讨论吧。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暴动队长邹文楷，这两次战斗他都是亲历者。

邹文楷的家就住在黄洋界山脚下的大井村。

我踏进邹文楷家，一眼就认出坐在堂屋里抽旱烟的，正是他。

“邹老！”我用当地习惯对他的称呼，叫了一声。

他健朗地站了起来，笑着说：“同志，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我和他两个，各人坐在一个井冈山特有的巨大的门臼上。邹老边抽着旱烟，边谈起了一九二九年初井冈山上的斗争情况。

“一九二九年一月，从湖南来的敌人进攻黄洋界和八面山哨口，我们暴动队同红军并肩守在哨口上。白天，敌人开炮把我们工事打坏了，天一黑，群众就上山来连夜将工事修

好，夜夜都是这样。我们在工事前面，埋下了密密层层的竹钉。哨口居高临下，倒悬着滚木擂石。敌人来了，我们一砍绳子，滚木擂石就象瀑布一样冲下山去，敌人想往旁边躲避，草丛里的竹钉一下就扎进他们的脚底板，大石块也紧跟着到了头顶，打得敌人哭爹喊娘，丢下一大批尸首，逃了回去。

“一连打了七天七夜，敌人一步也进不来。他们发急了，在山下找到了一个富农，名叫陈开恩，问他有没有旁的路能进井冈山。这个富农分子过去常来井冈山上采药，说路是没有，只有一条小溪，不好走。敌人许他二百元光洋，叫他带路。那天正下大雪。富农领着敌人从这条小溪里趟水进来。小溪的尽头，就是黄洋界背后的小井村，敌人就这样进了山，从后路向黄洋界进攻。

“这时候敌人进来得不多，完全可以把他们消灭。但彭德怀本来就主张放弃井冈山，出去流动游击，一听枪声响到后面来了，根本不顾黄洋界哨口上军民坚守阵地的要求，也不考虑桐木岭、朱砂冲哨口已经击退敌人多次进攻的事实，硬要五大哨口同时撤退。他自己一口气跑到井冈山南麓的下庄村，领着几百人翻过荆竹山走了。红四军第三十二团不愿跟他走，继续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留在山上打游击。”

邹老的这一段介绍，再一次证实了这条真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人少可以战胜人多，劣势装备可以打败优势装备；路线错了，本来能够打败的敌人不能打败，本来可以守住的阵地守不住，反革命复辟势力就大摇大摆地来了。

邹老继续说：“刹时，井冈山变了颜色。敌人嚎叫着‘井冈山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见人就杀，见屋就烧。烧了一次没烧尽，又来烧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大井村，烧了四次，南边那个下井村，先后烧了十三次！老人、小孩、妇女，跑不快，被敌人杀死的数也数不清。大小五井一共不满二千人口，被杀死了一千多口，有的全家都被杀绝了……”

谈到这里，邹老的话音越来越低沉，手上的旱烟管也轻微打着颤，他一连擦了两根火柴，也没把烟点着。我见他太激动了，只得劝他休息，约他以后再谈下去。

告别邹老后，我沿着村里的大路再往前走，隔着一片明镜似的水田，有一幢瓦屋，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年住过的地方。万恶的地方还乡团放火烧掉了屋子，只剩半堵红泥墙壁。但是，不管风吹、雨打、刀劈、火烧，它一直巍然屹立着。直到解放后重建毛主席故居陈列室时，人们才又把它砌进了新墙里。不屈的红墙呵，你在反革命复辟势力面前不折不挠，你是井冈山人的化身，你是无产阶级坚强的脊梁！

傍晚，我回到了井冈山大厦。一天不见，大厦里又出现了一批新的批邓大字报。最引起我强烈共鸣的是这样一张：

“井冈山人民决不许还乡团卷土重来！”

篝火燃烧荆竹山

篝火，最能唤起对革命游击生活的回忆。

在离井冈山主峰不远的山岭上，有许多石洞，大的可住下百把人、几十人，小的也能住

一个班。当年坚持斗争的井冈山军民常在那里憩息，后人称它为“游击队洞”。

敌人占了井冈山后，天天下大雪。比脚板宽不了多少的山路，消失了；横跨在深涧断崖上的攀藤树——那是游击队的“桥梁”——被大雪压断了。游击队员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战斗着。他们出击回来，到游击队洞里生起篝火，一边傍火取暖，一边讨论着新的打击敌人的计划。

几十年后的今天，在游击队洞的一角，仍能见到当年篝火的遗迹。看着它，就会想起“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艰苦的征战生活，不由对当年在这里点燃了篝火的老游击战士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此刻，我就坐在这样一位老游击战士面前。我是搭乘了半天汽车，又步行了小半天，才在这小山村里找到她的。她叫黄冬娥，将近七十了，是蓉市敬老院院长，这几天因为小孙女出麻疹，从蓉市回家来看望的。我问她是怎么来的，她把小孙女的两只小脚在手里握了握说：“用脚，走了来。”我听了不觉一惊。她淡淡一笑说：“习惯了，从小就走山路。坐汽车反而觉得摇晃。”她听说我需要了解井冈山反复辟斗争的情形，就拉起衣襟，将小孙女的身体裹紧一些，沉思起来。

看着她的神态，我暗暗感叹：怎么能想象得出眼前这位安祥的老妈妈，当年竟是单身入敌巢，从土豪手里缴来手枪的女战士！又怎么能想象她曾经是一位女歌手，站在山顶上唱一声“哎呀来”，好比军号震山崖！唯有井冈山上的风霜雨雪在她脸上刻下的痕迹，才把她的经历悄悄地给“透露”了出来——

在井冈山被敌人占领的那些日子里，她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游击队活动在井冈山主峰附近的荆竹山上。她每天扒开冰雪，抱来枯树枝，到一个个洞里、山棚里生起篝火，等待出去执行任务的同志们回来。

篝火不但给游击队员们带来雪夜的温暖，还是诱敌上钩的诱饵呢。一天，山上燃起了一堆大火，火堆边还蹲着许多人影。几十名敌人以为找到游击队了，贼头贼脑地爬了过来，仔细一看，糟了，原来那些都不是人影，只是小树杈子架着的几件衣服，敌人这才知道中了计，刚想逃，游击队员从树梢上、大石后出现了，黑暗里猛地撈过来许多明晃晃的梭镖，三下两下就把一批敌人刺翻在火堆里。以后敌人再也不敢夜里出动了。

黄妈妈告诉我，敌人不上山，我们就下山。那时天天有战斗。红军三十二团是主力，游击队虽然武器差，也很能打仗，他们一有机会就打下山去，打了就跑，敌人很头痛。

“他们经常出去打挨户团，打得可精采呢！”黄妈妈说。

“什么叫挨户团？”我不解地问。

“就是地主武装。我给你说一个王大个子的故事吧。”

“王大个子是个班长。一天，打听到挨户团有十个人，十条长枪，护送五担子弹到新城去，今晚就住宿在山下小村里。王大个子接受了任务，带着五个小伙子，要把五担子弹搞到手。

“进了村，村里的一个‘眼线’说，十个白狗子喝了二十斤米酒，除了一名哨兵以外，全睡了。

“王大个子把匕首笼在袖子里，装作很冷的样子，向哨兵走去。哨兵要来摸王大个子的口袋，想捞点外快。王大个子说：‘冷死人了，还检查。’嘴里说着，匕首就从袖筒里抽出来，直向哨兵喉咙刺去。只听得‘咕咕’两声，匕首进了喉咙。王大个子将哨兵慢慢放倒，走进屋子。敌人还口吐涎沫呼噜呼噜睡着，王大个子指挥同来的五个小伙子把敌人的步枪轻轻拎了出去，又将五担子弹搬走，敌人依旧象死猪一样毫不动弹。”

“回到山上，同志们还围着篝火等候他们回来。有人问王大个子为什么不把十个饭桶打死。王大个子风趣地说：‘我也这样想过，但一来耗费子弹，二来他们辛辛苦苦挑了子弹送来，连十支长枪也作了陪送，我还想每人赏他们十块光洋呢！’”

“从三月起，湖南的反动军队忽然退出了井冈山。江西的反动军队本来就弱，这时也退走了。起先我们还不知道为啥，后来才晓得敌人自己跟自己打起来了。”

这件事我们是知道的，那就是当时爆发了蒋桂战争。蒋介石派兵沿长江西上，与桂系军阀争夺两湖。湖南的何键为了对付蒋介石，就赶紧从井冈山撤退军队，只留下了地方保安队。这正证明了毛主席早就作出的英明预见。敌人内部的稳定是暂时的，新的分裂一开始，他们就无暇顾及井冈山了。

趁这个形势，坚持在山上斗争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和井冈山群众武装，趁机打下山去，赶走了国民党保安队，收复了茨坪和大小五井，重新成立了工农兵政府，军民一边加强警戒，一边抓紧春耕，井冈山上又扬起了愉快的歌声：

“哎呀来——

井冈山上水源长，

毛委员恩情象爹娘，

工农军民团结起，

穷人出头把权掌。”

黄妈妈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真叫人痛快。那个给敌人带路的狗富农陈开恩，也被我们抓住枪决了。”

“同志哪，你说说，敌人有机枪大炮，我们没有。敌人吃大鱼大肉，我们围着篝火咽野菜。但我们还是将敌人打败了，这是为啥？就是因为敌人反动，不得人心。我们要革命，他们要复辟；我们要解放，他们要搞法西斯；我们要奔好日子，他们要把我们推到死路上去。归根结底，是我们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所以他们非失败不可。”

告别黄妈妈，我一路上仔细咀嚼着她即兴而发的这一段议论，觉得意思很深。一阵山风吹过，路旁白色的桐花飘落了一地。记得半个月前老倭们说过，桐花一谢，杜鹃花就开了。这不是桐花已经谢落了么？我猛然醒悟地抬起头来，看见山岗上果真已经绽出了一片红艳艳的杜鹃花。这情景触发我想起了一位革命烈士在刑场上作的两句诗来：

“红白总要分胜负，

白花谢了开红花。”

这不正是井冈山上这场反复辟斗争的生动概括吗？

“为了革命自带粮”

复旦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张东霞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崎岖的山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精神奕奕的干部，边走边唱着自己编的山歌：

“草丛石岩当住房，
为了革命自带粮……”

当时，我们的根据地由于遭到蒋介石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经济情况十分困难，粮食尤其感到紧张。红区的人民群众宁肯自己吃地瓜，挖野菜，也要把粮食节省下来支援红军。地方干部们更是以身作则，节约每一粒粮食，支援前线。按工农民主政府规定，乡以上干部是可以吃公粮的，但许多干部却总是从自己家里带了干粮去办公，而把公粮节省下来。唱这首山歌的长冈乡工农政府主席江善忠，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

“为了革命自带粮”，这不仅是红区干部节粮支前的具体措施，更重要的，反映了他们鄙弃特权，不谋私利，一心为革命的崇高思想境界。

办公事，吃公粮，似乎是理所当然。可是江善忠不这样认为，他说：“公粮是公家的，要让它为革命多发挥作用！”他直接掌管全乡四百多户人家的公粮征收工作，每天都有粮食从他手边过，但他从未为自己动用过一粒。因为他认为不吃公粮是光荣的，而利用职权私自动用公粮则是可耻的。有一次，他照例回家去取口粮，发现母亲和刚生下孩子的妻子都在喝野菜粥，他便悄悄离开家，到野地里挖些野菜，又忙着去为革命奔走了。群众知道后感动得流下泪来，劝他：“老江，你工作这样忙，吃点公粮也是应该的，别把身子骨熬坏了。”他微笑着说：“干部是群众信得过，推举出来的。当了干部，应当为人民多做工作，而不能比群众多得报酬。”

这话，说得何等好啊。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在无产阶级看来，干部就是“社会公仆”，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应该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多干工作，不计报酬，处处成为群众的模范。要求群众做到的，自己先做到，群众暂时还做不到的，自己也努力做到。

剥削阶级则不然，在他们那里，官儿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在剥削制度下，“升官”总是同“发财”连在一起。在修正主义的苏联，那些从资产阶级法权的肥土沃壤中孳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其贪婪性远远超过它的老祖宗。试看那些当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和那班腐烂发臭的精神贵族，哪一个不是高官厚禄，养尊处优，把职权当特权，吮吸

劳动人民的血汗。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也是这样。他在重新工作以后，带头大刮“资产风”，兴建“安乐窝”，真是比地主资本家还要厉害。因此，列宁曾经坚决地指出，要“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为了革命自带粮”的精神，反映了革命者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有了这样的革命觉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就可以忍受最大程度的艰辛和痛苦，作出一切牺牲，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有了这样的革命觉悟，在胜利的条件下，他就能够经受新的环境的考验，克己奉公，一尘不染，抵制任何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的侵袭。有了这样的革命觉悟，在担负党和人民赋予的重要责任时，他也能大公无私，不搞特权，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这种革命觉悟，如一位烈士的绝笔诗中所写的：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江善忠也正是这样。当敌人要用水把他烧死时，他站在悬崖上，用生命的最强音，又一次表示了他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机会主义者总是要歪曲“革命”这两个字的真实含义。邓小平以资产阶级市侩的眼光来看革命者，胡说什么“革命靠物质刺激”。江善忠的光辉事迹把邓小平的谬论驳得体无完肤。当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围剿”下的革命根据地，一天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物质基础可谓差了吧，根据地的人民，生活可谓艰苦了吧，为什么红区军民还能够那样忘我地参加战斗呢？这难道是物质“刺激”出来的吗？不！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结果。江善忠的事迹，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典范。

“为了革命自带粮”的精神，可以永远成为我们保持革命传统，反修防修的抗菌素。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我们继承和发扬这个革命传统，该有多么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啊！

“栽树不歇凉”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工农兵学员 冯海瑚

在陕北清涧河上游，有一座林木葱茏的花果山。一九七二年的一天，正在给果树剪枝的一个老汉突然从树上跌下来，滚到了石崖下。亏得过路的矿工发现了，才把他背回家。可是过不了几天，老汉又要上山去。许多人夺住他手里的铁锨说：“老黄哪，你革命几十年，贡献不小了。一个七十岁的老汉，退休了就好好休息吧。”老黄说：“不，人退休了，

干革命可不能退休。为了改变咱陕北面貌，使毛主席他老人家放心，俺就是豁出命来也甘心。”

老黄名叫黄立德，抗日战争时期就是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伟大领袖毛主席多次亲切地接见过他。他种了大半辈子的树，退休已经十多年，还是整年在山上忙着：春天育苗嫁接，夏天栽树防风，秋天看园护果，冬天封土涂白，把他的全部心血都花在育林上。生产队经济一天比一天富裕起来，他从来没有要过一个工分；剪下的树枝堆成垛，他从来没白烧过一根柴；几万斤果子垒得象山崩，他从来没多拿过一只苹果或梨。贫下中农都感动地说：“老黄真是只栽树不歇凉的人哪！”

只栽树不歇凉，这是共产主义者崇高的思想境界。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同旧的所有制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他们为了实现宏伟的革命目标，只想怎样多作贡献，何曾盘算过个人能从中分享到若干福利。在他们的头脑里，“劳动是为了获取报酬”的资产阶级法权观念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前人栽树后人歇凉”这句中国古话所包含的舍己为人的精神，在有无产阶级以前，没有哪个阶级能做到这一点。

除无产阶级以外，各个阶级都把栽树歇凉看作理所当然。剥削阶级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世代相因，根深蒂固。在他们看来，如果不为自己歇凉，栽树岂不成了傻瓜。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经混迹于广大人民群众辛勤“栽树”的行列之中，挖过一小块土，就向党 and 人民伸手要特权。他高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正象电影《决裂》中的那个副校长曹仲和，认为“革命几十年，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在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心目中，资本家既然是按资本来分配剩余价值，“革命”当然也应该成为享受特权的根据，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公平交易，合理合法。因此，他总是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象苍蝇一样整天围着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当革命人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时，就要暴跳如雷了。

无数革命先烈，已经为我们树立了栽树不歇凉的光辉榜样。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浇灌共产主义的幼树而不为自己谋取一席荫凉。他们具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牺牲精神，“蹈火归来又赴汤，只身亡命是家常”的英雄气概，“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伟大胸怀。他们何尝夸耀过自己的一点“功劳”、“苦劳”和“疲劳”？一切把革命当作投资，等着论功行赏，甚至伸手向党 and 人民索取特权的市侩“革命家”，如邓小平之流，在这些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面前，难道还有容身之地么？

黄立德栽的不是普通的果树，而是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大梁”。他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不仅是他乐于栽树的精神，而且是他能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勇敢决裂的彻底革命的思想 and 行动。我们每个革命同志虽然处在与黄立德不同的岗位上，但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都在“栽树”。干革命就是为子孙后代“栽树”。让我们都来做栽树不歇凉的人，不但自己这样做，我们的后代也要坚持这样做，那么，“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深入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

康 立

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有过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的变化，资产阶级的内部状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我国的现阶段，有老的资产阶级，有新的资产阶级，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是新老资产阶级在党内的政治代表。要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在今天的状况进行深入的研究。

先看老的资产阶级的变化。全国解放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力量，他们顽强地对抗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妄图“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对此如丧考妣，为了夺回失去的天堂，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在党内走资派的策应和支持下，组成了公开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来同无产阶级进行直接的较量。伟大的反右斗争沉重地打击了这一小撮反动分子，使资产阶级中的这部分人很难再公开聚集起来重演“章罗联盟”的丑剧。他们尽管还在继续散发出臭气，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及其生活方式毒害着人们，但由于他们的屁股后面打着老吸血鬼的印记，人们比较容易识别。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中的一部分人，经过解放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有不同程度的进步；但也还有不少人仍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世界观，把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当作资本，妄图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用各种方式培养自己的接班人，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

再看新的资产阶级。这是一批社会主义时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早在合作化以前，就出现了靠投机、剥削起家的新资产者和新富农。他们不仅从一部分工人中、机关工作人员中产生出来，而且经常地大批地从小生产者中产生出来。他们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勾结一起，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为非作歹。这类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比较容易识别。另一类新资产阶级分子，出身很好，在红旗下长大，入了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

谓红色专家和领导干部；但他们从思想到生活却都是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科学至上”、“知识私有”、“读书做官”、“入党做官”，以及“一招鲜，吃遍天”、“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等，奉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座右铭。在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时，那个发誓要为“一万元稿费而奋斗”的右派分子刘绍棠就是一个典型。林彪反党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也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他们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在夺取自己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时，表现得特别贪婪，恨不得把属于国家或集体的财富统统吞下肚子里去，其手段之狠毒，方法之繁多，连老的一代资本家都望尘莫及。

至于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有的是混进党内的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原来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大量的则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新老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既有老的资产阶级妄图夺回自己失去的天堂的疯狂性，又有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冒险性；既有老资产阶级分子的老奸巨猾，又有新的资产阶级无比贪婪的特点。它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特性。

在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由于党外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的地位，阶级力量的对比又不断地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在变化，他们已经很难推出自己的头面人物来同无产阶级公开较量了。在这种状况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党内。党内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时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核心力量，是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而不在党外。我们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机会主义头子的斗争，就都是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

在旧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着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在今天，这种地位已由党内资产阶级取而代之。走资派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代表。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们，如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手里掌握着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可以借用“国家”、“党”、“上级”、“领导”的牌头，制定和推行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力图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小官进行压迫，实行白色恐怖。因此，毛主席早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就已尖锐地指出：“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产生党内资产阶级？为什么资产阶级能够继续存在和不断产生？从经济上说，是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法权，既保护着老的资产阶级，又孕育着新的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法权的主要内容是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八级工资，等等。在社会

主义社会中，由于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还必须实行商品制度。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除了由国家计划统一调拨和某些按需分配外，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在两种所有制的各自内部，在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几乎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实行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商品交换和货币交换。当然，由于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的商品制度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而不是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制度。但不管如何，它仍然是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只要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制度，商品交换原则还在起作用，就必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还拿定息，享有较高的工资，占有较多的商品和货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还没有取消的那些资产阶级法权上，强烈地要求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大量地从商品制度中孵化出来。他们或者化公为私，贪污盗窃，把属于人民的货币、商品据为己有；或者投机倒把，牟取暴利；或者把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直接进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两极分化。如果说，在几百年前，曾经从商品中诞生出最早一代的资产阶级，那末，在现阶段，也一定会从商品中孕育出最后一代的资产者。

最危险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走资派最本质的政治特征。他们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力图把商品交换原则贯彻到一切领域中去。他们鼓吹“利润挂帅”、“产值第一”，搬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取消计划经济，用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代替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在实质上也就改变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他们在企业管理中，歪曲毛主席的“管理也是社教”的指示，从来不讲工人是工厂企业的主人，不讲干部要同工人搞“三同”和拜工人为师，更不讲工人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尖锐对立的问题。他们对工人搞“管、卡、压”这一套，把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变成猫鼠关系，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妄图恢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他们实行“物质刺激”，“奖金制度”，不仅为了使少数特权阶层能方便地侵吞大量社会财富，而且腐蚀广大劳动群众，把人与人的关系变成商品关系、金钱关系、买卖关系。在政治思想领域中，他们也是一切按照商品交换原则去办事的。他们把自己当作商品，把参加革命当作“入股”，要求根据“功劳”、“苦劳”、“疲劳”来“分红”，竭力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向无产阶级卖高价。他们封官许愿，论功行赏，用商品交换原则来代替党的组织原则。总之，他们同过去的资本家一样，是商品和资本的人格化，一切都只是为了商品而存在。当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地全面地恢复资本主义制度。

限制还是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过来就会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性质。但在现阶段，我们对资

产阶级法权还只能限制而不能取消。只要还存在着社会的阶级划分,还存在着三大差别,只要劳动还没有成为人们的“第一生活需要”,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提供极大丰富的社会产品,就只能继续实行甚至保护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建设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限制商品制度,绝不等于不发展商品生产。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但是我们现在发展商品生产,是为了最终消灭商品生产,对于商品生产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弊病,必须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防止商品交换原则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对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的侵蚀。为此,必须充分重视相互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工作,在当前就是要批邓。实践证明,那些对资产阶级法权触动或批判较少的单位或部门,资产风就盛行,批邓就有阻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也就搞不好。

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法权反映着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则代表着正在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工农群众直接参加管理;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办五七干校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推动国家机关的改革;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赤脚医生的大批涌现和合作医疗的普遍开办,这些共产主义的幼芽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冲刷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痕迹,促进了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蓬勃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处在矛盾的运动过程之中,或者向共产主义前进,或者向资本主义倒退,两种前途的命运至今尚未见最后分晓。这里,关键的问题是有没有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映了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则代表了衰亡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我们务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断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从对资产阶级各翼的分析、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看到社会上老的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存在,而且还要注意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特别要认识到党内走资派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为此,我们必须永远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二十条》的要害在哪里？

延 风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二十条》)，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这个文件的要害在哪里呢？在于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这个文件，摘录了上百条毛主席的话，就是偏偏“遗漏”了毛主席分析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分析党内资产阶级的重要论述。

这个文件，罗列了一大堆“无产阶级的敌人”，就是偏偏“忘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重点对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

早在一九六四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毛主席就已尖锐地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同时，毛主席还提出了“管理也是社教”的著名论断。毛主席说：“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邓小平在指挥炮制《二十条》时曾经多次声称，要“整顿企业管理”。《二十条》的每一稿，也都把“整顿企业管理”作为一个重要的条目。如果真的要讲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那么就不能不引用毛主席的“管理也是社教”这一著名论断，就不能不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的精神，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企业管理的基本思想。但是《二十条》的历次修改稿，都对此讳莫如深，仅仅在被邓小平倚为“顾问”的那个“理论家”修改的十月二十五日一稿中，在“又红又专”的条目里，写上了这样几句话，

“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要知道机会主义是怎样通过引用一两句革命词句来阉割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的吗？这里又是一个典型！

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对象，分析了党内资产阶级的特点、根源和战胜他们的方法，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核心和主要力量已经不在党外而在党内，党内资产阶级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党内资产阶级与工人、贫下中农的尖锐对立，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因而，承认不承认党内存在资产阶级，承认不承认党内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坚持还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根本标志。

列宁说得完全正确：“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邓小平及其《二十条》明目张胆地砍掉了党内资产阶级的概念，砍掉了党内资产阶级是革命对象、斗争对象的论断，正是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当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把无产阶级专政一刀砍掉，这一次邓小平则在《二十条》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点对象一刀砍掉，真可谓无独有偶，异曲同工。砍掉了革命的对象，那么革命岂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长期以来，从刘少奇到邓小平，竭力抹煞和掩盖毛主席关于“管理也是社教”这个指示的重要内容。他们“就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看到党内资产阶级的字眼或是包含有揭露党内资产阶级的内容的论述，就心惊胆战，就要一刀砍掉。这就正好暴露了他们心里有鬼，暴露了他们自己就是毛主席所批判的那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他们砍掉了革命的重点对象，“三同”也被一起砍掉了。这是并不奇怪的。怎么能指望这些党内资产阶级同工人实行“三同”呢？他们不但自己绝不可能实行“三同”，而且也极力反对和害怕企业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实行“三同”。这是因为，他们正是要在企业的领导、管理人员与广大工人之间划上一道“不同”的鸿沟，强化和扩大在人们相互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的所有制蜕变成成为走资派所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毛主席关于“三同”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根源和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依然是阶级关系。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上，资产阶级法权还严重存在。在正确路线之下，在革命队伍内部新型的同志关系就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就能促使干部与群众之间划等号，不断限制和破除人们相互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防止企业领导和管理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如果什么地方错误路线占了统治地位，干群关系就会变成猫鼠关系，父子关系，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

压迫的关系就会重新出现，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人员就会变成吮吸工人血汗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社会主义企业也就只剩下一块虚有其表的招牌了。这正是邓小平所梦寐以求的东西，他又怎能容许把这个秘密公诸于众呢！

他们对待毛主席的指示，这也砍，那也砍，剩下的，就只有学技术的几句话。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学技术，而在于为什么学，学了干什么。毛主席要求企业管理人员学技术，是为了接近工人群众，熟悉生产过程，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普通劳动者。而《二十条》一不讲打倒党内资产阶级，二不讲“三同”，这就把毛主席指示的原意完全搞反了。似乎管理搞得好不好，只是取决于技术学得好不好；有技术的，就是“管”人的，没技术的，只能被人“管”。他们的本意，正是为了顽固地宣传“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龌龊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列宁：《怎样组织竞赛？》）在今天的苏联，勃列日涅夫集团不正是依靠一小撮技术贵族对广大工人进行管理，实行罪恶的资产阶级专政吗？

对待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也反映了两条根本对立的办企业路线。

“管理也是社教”，就是说企业管理问题也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和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不断铲除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把企业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

而在邓小平和《二十条》那里，情形被完全颠倒了过来。企业管理简直成了“管、卡、压”的代名词。《二十条》里不就明明白白地写着“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种必要的规章制度，是整理企业管理的首要任务”吗？管理就是一切，至于政治挂帅、工人是工厂的主人等等，统统是微不足道的。这种不讲阶级斗争、不讲路线的管理制度到底是些什么货色，《二十条》上也是写得明明白白的。他们把“建立岗位责任制”说成是企业管理的“核心”，妄图把工人死死地束缚在机器上，沦为机器的奴隶。他们下令要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种种形式“一律撤销”，要工人“一律回到生产岗位”。他们恶毒诬蔑工人运用“四大”武器管方向、管路线是“造无产阶级的反”，“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企业的规章制度？这分明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工厂法典！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的今天，《二十条》的出笼，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邓小平在自己炮制的文件中砍掉了走资派的概念，以为这样就可以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有了复辟的机会。但这只是他的如意算盘。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前进步伐是不可阻挡的，任何企图复辟的人必将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驳“伤害论”

新 戈

邓小平为了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采取挑拨离间的卑劣手法；制造了这样一个谬论；说什么“运动一来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这个反动的“伤害论”；是对我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恶意歪曲，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无耻攻击。它的要害，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时；曾经指出：“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的武器。建国以来；我们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土地改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论哪一次都是充分依靠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进行坚决的打击；有哪一次是“伤害老工人”呢？就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说；正是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下；工人阶级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同修正主义路线斗；同党内外资产阶级斗；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把那些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大批工人出身的干部走上了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广大工人群众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真正成了工厂的主人。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饱尝旧社会苦难、遭受修正主义路线迫害的老工人，感受尤为深切。而邓小平却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了老工人；这完全是无耻的捏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广大干部来说；也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无论是老、中、青干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考验，都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老干部，群众批一下也是可以的、应该的。这正是按照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使他们同修正主义路线决裂；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正如有的干部所说：“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没有自己政治上的新生。”明明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邓小平却诬蔑为“伤害”。其实，真正“伤害”革命干部的正是他们那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瞿秋白的“惩办主义”，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刘少奇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林彪的“罢官运动”，哪一个不是把干部作为敌人来对待呢？就是这个胡说文化大革命“伤害”了干部的邓小平；叫嚷

什么干部要“一律下放改造”，现在却贼喊捉贼，倒打一耙。这只能证明，邓小平翻案不得人心，只好乞求于造谣和诬蔑罢了。

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邓小平的“伤害论”，实际上包藏着一个极大的祸心，就是要鼓动那些过去犯有错误、受过群众批判的干部，跟他一起发泄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满，一起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无论是老干部、青年干部，包括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干部，都应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如若不然，象邓小平这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确实在那里招手呢！

恩格斯说过：“对一些人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无不感到扬眉吐气，充满主人翁的自豪感；只有那些地主、资产阶级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才会感到受“伤害”，感到受压迫。邓小平所谓“运动一来”受到“伤害”的，正是指的二十几年来被我们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专了政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邓小平一上台，就如此愤愤不平地为那些受到无产阶级专政“伤害”的人鸣冤叫屈，这充分表明邓小平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愿望。这就难怪全国刚一解放，邓小平就紧跟刘少奇叫嚷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一个在天津，一个在四川，和资本家眉来眼去，打得火热；难怪一九五七年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邓小平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和刘少奇一起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大喊大叫无产阶级专政应当“愈来愈缩小”，“我们过去专政多了，以后可以放宽点”，扬言要把资产阶级的帽子丢到“高炉里”去；也难怪一九六一年前后，正当国内外阶级敌人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时，邓小平就在党内遥相呼应，别有用心地提出“社会主义优越在哪里呢？”并且说什么“因为切身利益吃苦头，该骂嘛，骂一下好”，公开挑动一切反革命分子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邓小平和地、富、反、坏、右在政治上完全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就象《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就必然要疼在邓小平的心上；邓小平垮了台，地、富、反、坏、右也就倒了霉。所以邓小平的“伤害论”，正是喊出了一切被打倒的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极端仇视和恐惧的心声。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特别强调“伤害”了“有经验的干部”这句话。他所说的“有经验的干部”，是指那些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老干部吗？不是。对于这些同志，邓小平是要通过“整顿”加以排斥和打击的。他所谓“有经验的干部”，实际上就是那些和他一样坚持搞修正主义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文化大革命“伤害”了这种人，这倒一点不假。因为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们所搞的修正主义罪行不揭露不批判，无产阶级专政能巩固吗？这在邓小平看来叫“伤害”，而在无产阶级看来叫革命。总之是一回事，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阶级打倒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然，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革到党内走资派头上这一点，邓小平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是十分敏感的。一九五七年，正当社会主

义革命不断深入时，邓小平就不打自招地说：“现在反革命少了，但是我们的思想不变，天天还是尖锐化，势必搞到我们自己头上。”看，党内资产阶级对于革命革到他们头上是多么惶惶不安。正因为这样，在建国以来的党内历次重大路线斗争中，邓小平总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为那些机会主义头子保驾、翻案。我们批判了彭德怀，邓小平跳出来：“反右倾百分之八十、九十搞错了”，叫嚷要“一风吹，一律平反”。文化大革命初期，眼看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将垮台，他又伙同刘少奇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蒙混过关。这次又赤膊上阵大刮右倾翻案风。这证明，邓小平的“伤害论”，不仅要保护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而且要保护那些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资产阶级。

如果说，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伤害有经验的干部”，是要为被打倒的刘少奇、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翻案，那么加上“运动一来”这几个字，就暴露了邓小平还要翻二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案，翻民主革命的案。“运动一来”，岂不是把我党五十多年来对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批判都一笔否定了吗？陈独秀、瞿秋白、罗章龙、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头子，岂不都要“平反”、都要“恢复名誉”了吗？邓小平不愧是个翻案的专家。照他这么说，我们党的历史就该颠倒重写。但是，中国人民用鲜血写成的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和灾难。也永远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胜了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国革命的航船才绕过暗礁，冲过险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邓小平妄图为那些早已被中国人民唾弃、成为政治僵尸的机会主义头子招魂，使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分析邓小平所散布的“伤害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口口声声讲阶级斗争熄灭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放宽”，并不是真的不要专政，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要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刘少奇不就说过，“解放全人类，也包括地、富、反、坏、右”吗？林彪不是也在《“571工程”纪要》中叫嚣，要让那些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迫害”的人得到“真正的解放”吗？邓小平不是到处替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撑腰打气，拼凑反革命复辟的“还乡团”吗？这些家伙，语言虽然不同，目的却是一个，就是要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打人、放火、砸车，无所不用其极，就把邓小平要搞法西斯专政的狰狞面目，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

毛主席早就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为我们总结的这个经验，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不可须臾离开的一个护身法宝。对邓小平这类党内资产阶级，我们决不能同他讲“平等”、施“仁政”，不管他们咒骂我们是“秦始皇”也好，散布什么“伤害论”也好，我们就是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当前深入开展的这场批邓斗争，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有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真正得到巩固。



革命与资本

——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

戚承稷

读完《汪精卫卖国记》，总觉得文中欠缺了什么似的。细一思索，原因在于只讲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后半生；没有讲清他投机革命的前半生。缺少了这段历史的介绍；一部历史也就成了不可理解的了。

汪精卫这个人，今天已成了卖国贼的代名词。但在清朝末年，却曾经是个名气颇为响亮的革命党人。这在现在的青年中恐怕是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他原名汪兆铭；出身于广东一个破落的小官僚家庭。一九〇四年，二十岁上渡海赴日；留学东京；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翌年，与孙中山结识；参加同盟会；任评议部部长；年底创办《民报》；开始用“精卫”的笔名发表文章；后来且曾一度担任了《民报》的主笔。据《山海经》记载：古代炎帝有个女儿，名叫女娃；因游东海淹死；灵魂化为精卫；为使世人不再溺海而死；年复一年，衔石填海。晋代诗人陶渊明就曾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悲壮诗句，歌颂了这种百折不回的坚决意志。汪在当时以精卫自勉；可见他最初的志向原是正确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中；以青年志士的面目出现，撰文鼓吹革命，痛斥康、梁；笔锋犀利；当时是着实风头过一阵子的。

然而，真正使汪精卫走出了革命风头的，则是他的谏刺摄政主裁洋。

一九一〇年，汪精卫出于对革命的悲观失望，转而崇尚暗杀主义。于是，结伴赴京，谋刺摄主；事泄被捕；哪咄入狱。这在骨子裏固然是脆弱；劲骨的反映；但表面上却未免被误认作志士殉国的壮举。何况；汪在狱中引吭高歌；激昂陈词；大有苦烈士的气概。这狱中的诗，不妨抄录二段在下面——

慷慨敬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诗颇可一观，人却不足取。汪后来的汉奸生涯，证明了他只不过是唱唱高调，结局终于是一条走狗而已。但即使是当了走狗吧，诗却还是要作下去的。一九三九年，汪在汕头海面上叛国投敌，诗兴忽又勃发。但这一回，是只能哼哼汉奸调了。这诗，不妨也抄录一段在下面——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不作零丁叹者，是针对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而言的。文天祥诗的结尾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汪既已腆颜事敌，苟且图生，自然是要发誓“不作零丁叹”的了。通观前后两诗，竟判若两人。但这是不足为怪的。小生的俊扮，原仗着在脸上厚厚地涂着一层粉。如果卸妆时将粉洗去，只留下鼻子上的一抹白，便不免露出了小丑的怪相。

话还得说回来。在当年，汪精卫确实曾经革命过那么一阵子；而这段所谓光荣历史，后来也就成了他卖国时的所谓资本。

卖国先须卖身。身价的高低须视本人政治资本的多寡而定。汪精卫当时如果只是个政治小瘪三，搨不出革命元勋的金字招牌，日本主子自然是不会看中他的。即使看中了他，也决计不会开出傀儡政府头子的高价。不过，汪的这点政治资本，说来也真可怜。一九二七年七月间，汪精卫追随蒋介石炮制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所谓宁汉合流，在武汉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彻底地现出了假左派真右派的狰狞本相，已经再也没有留下多少资本可供他利用了。这一点，日本主子的心中并非不明白。无奈走狗也不容易找，要找条好走狗更不容易。既然汪记空头公司还能维持门面，不妨暂时将就一下，反正不过是用来骗骗人罢了。

革命可以被某些人当作资本看待，但把革命当作资本看待的，决非真正的革命者。

鲁迅曾说他自己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这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无产者的奋斗，在于求得人类的解放，决不为了谋求个人的一己私利。如果认为自己革命有功，动辄向党向人民索取名誉、地位，小不如意，便怨气冲天，牢骚满腹，活象欠了他个辈子的债，那就简直是把革命当作求息的资本，而把自己比作汪精卫一流的人物了。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公开鼓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遵循的即是此类反动逻辑。

汪精卫之由革命者转化成为卖国者，有一个过程。他是从卖身通向卖国的大门的。早在他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后不久，就已改变初志，转轍易向。“不负少年头”的革命调子余音未息，回清廷的勾搭已告开始。接着，便是与警察头子曹锟亲笔诗整座和，赠梨“耳甚何苦更相煎”的忏悔曲，诚惶诚恐地当起叛徒来了。既已堕落，遂无顾忌。于是，狱中接受陆建章赠款，出狱后与袁氏太子袁克定结为把兄弟，逼孙中山向袁世凯交权让位，为袁氏登上总统宝座而奔走拉票。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外表上虽还顶着革命者的虚名，内里却早已神气索然。至于他后来在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期间，混迹左派队伍，大唱革命高调，那已是阴谋家的玩弄权术，肉食者的争权夺利，目的在于欺骗人民，捞取政治资本，已

经完全不是最初的那个汪精卫了。沿着这条道路滑下去，卖国是必然的结果。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作为一定阶级的个人而存在的。汪精卫之所以成为半截子革命者，不能单从个人品质上去找原因。必然性存在于偶然性之中。从不同个人的个别行为中，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可以归纳出其共同的阶级本质。汪精卫的一生，正是从一个侧面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格。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严复、章太炎等人就都是一些半截子革命者。他们曾经程度不等地当过拉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拉车夫，但当革命深入到一定阶段时，便都一个个拉着车屁股向后转了。汪精卫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政治上更堕落罢了。

共产党内的革命同路人，也都同样地受着这条规律的支配。他们的身子虽然参加了共产党，但头脑里装着的全是资产阶级脏东西。他们不仅顽固地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且时时刻刻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的党。他们也可以革命那么一阵子，但当革命触犯了他们的阶级利益时，便很快地由革命的同路人转化成为革命的公开敌人了。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颇曾呐喊过一阵子。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组织学生上街讲演时，俨然是个学生领袖，也曾经革命过一阵子。然而，由于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当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时，便先后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曾几何时，一个堕落成托派、汉奸，一个投奔到胡宗南那里去当一名小特务了。邓小平也属于这类半截子革命者。他早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参加了我们的党，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便跳出来疯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终于成为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很喜欢夸耀自己的革命的过去的，但革命的过去既已成了他今天搞反革命的资本，那就不单是否定和毁灭了革命的过去，而且证明了他当年的参加革命不过是投机而已。其实，就连汪精卫这种不齿于人类的大汉奸，当年又何尝没有过革命的过去。汪精卫在《民报》上撰文鼓吹革命那一阵子，就当时的地位和影响来说，比起邓小平的过去可要阔得多呢！

无产者是当代世界上最先进的阶级，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它的希望在于未来而不在于过去。革命的过去是值得珍贵的。但如果两只眼睛只望着自己的革命过去而忘掉了革命的未来，忘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那实际上就是背叛了革命。正因如此，无论是革命的新干部或老干部，都应当严格要求自己不吃老本，不断地为人民立新功。

革命是不能当作牟利的资本的。但这个道理，邓小平这类修正主义大官们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呜呼！

食虫类·猿猴·走资派

陈 熙 春

对于人类的祖宗，过去只晓得是猴子。猴子之前是什么？不得而知。最近看了《自然辩证法》杂志刊登的《人类的继往开来》，才知道猴子的祖宗是一种以虫蚁为食、形似老鼠的哺乳动物，名叫食虫类。从食虫类到猿猴，有过一次上树的革命；从猿猴到人，又有过一次下树的革命。没有这两次革命，恐怕至今还没有人。

凡革命必有分化。食虫类的上树革命便是如此。一亿多年前，食虫类生活在地面，有昆虫、草叶可以饱腹。但地面终究不是一个太平世界。不仅飞扬跋扈的恐龙和凶猛的食肉动物随时威胁着食虫类的性命，就是专门传播瘟疫的微生物也足以使它们大批丧生。为找出路，一部分食虫类便闹起了上树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原不过是要寻一条生路。但即使如此，也要遭到另一部分食虫类的反对。于是只好分道扬镳，各奔前程：有的上了天，成了蝙蝠一类似鸟非鸟的东西；有的下了海，成了鲸、海豚；有的入了地，如各种鼠类，以后就是世代掘地洞；有的象刺猬，自以为有一身带刺的盔甲，干脆就什么地方也不去了。

因此，食虫类有两种：革命的和革命的。

上树的食虫类，经过几千万年演化成了猿猴，生物学上叫“灵长类”。猿猴靠着双臂攀援，一晃就是几米、几十米，在树上也着实快活了一阵子。但是，“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加上地球上沧海桑田的巨变，使得森林大片覆灭，树倒猢猻散，猿猴的分化也就势在难免。一部分趁在大难临头之前，逃进了树林深处，死抱着旧的生活方式。来不及逃的，就只好活活饿死在树上。另一部分革命的，就勇敢地下了树。但即使是革命的，有的革到一半又不革了。比如山猿，下树走了一阵，遇到困难就动摇了，重又回到树上，终于成了复辟派。唯有那些下树后革命到底的，经过长期的痛苦的磨炼，终于直立行走，在大自然面前挺起了腰杆，迈开了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以及我国云南开远等地发现的拉玛古猿，就是从森林古猿向人类方向迈进的革命猿类。

因此，猿猴也有两种：革命的和革命的。

据说达尔文因为发明进化论，使人们知道了猴子是人的亲戚，就被绅士淑女们骂为猴子的子孙。其实同是猴子的子孙，也常常是同宗不同路，不能一例而论的。特别是人类出现阶级后，有的压人，有的被人压，有的剥削人，有的被人剥削，有的花天酒地、荒淫无耻，有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即使开始同是革命、造反，后来又分化，更是屡见不鲜了。远的

不说,就说今天吧,资本主义制度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快进棺材了,但是邓小平这类走资派,却要倒行逆施,搞资本主义复辟,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因此,人也有两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

鲁迅说过:“‘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有革命,才有前进,才有发展,倒退总是死路一条。食虫类上了树,才分化出“手”和“脚”,促进了前肢大拇指与四指对向作用的发展,促进了眼睛和脑子的发展。其它不管是上天、入地、下海的,都只能在不同环境里苟延残喘。入海的,离岸下水后再也回不了陆地;上天的,由于一年四季不着地,脚变得又细又短;入地的,象鼯鼠只会成天躲在地下,见不到阳光,天长日久,眼睛退化得只有两粒小米太小,一到地面,两眼漆黑,完全失去了活动能力。同样,那些猿猴中反对下树的复辟派,如长臂猿、黑猩猩、大猩猩等,当年死抱着树不放,至今不是在树林中臂行过活,就是关在公园的铁笼里供人观赏,或是在杂技场变把戏给人看。可以肯定,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一个阶级,也必将象食虫类、猿猴中的反动派一样,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当然,这一定要到阶级消灭以后。

革命无止境。但革命的总趋势总是前进的、发展的。人类的发展是如此,社会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商标学研究一得

戴子英 周献明

旧上海的熟肉店哪家最有名?五十岁左右的者上海会告诉你:陆稿荐。相传苏州城肉有一个摆狗肉摊的,姓陆,有一次周济了一个乞丐,乞丐走了,留下了自己睡的一条破草席,姓陆的便拿来生火,不想用破草席烧出来的狗肉异香扑鼻,鲜美异常——这乞丐原来是个仙人。于是姓陆的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店也从苏州搬到了上海,招牌就叫“陆稿荐”(稿荐即草席的意思)。同行们看见这块招牌能赚钱,于是东也“陆稿荐”,西也“陆稿荐”,有的还加上种种冠词:“真正陆稿荐”,“老牌陆稿荐”,“自苏迁沪百年老店陆稿荐”,等等。“陆稿荐”几乎成了熟肉店的代名词了。

显然,这段故事完全是资本家编造的生意经。用文字写在木牌上挂在店堂或工厂门口,称为招牌,画成图案印在商品或商品的包装纸上,称为商标,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资本家做生意的标记。招牌或商标有了名气,商品的身价也就高了,资本家就可以借此招徕顾客,募集股份,在资本竞争中击败其他同行。某个招牌或商标失去了信誉,资本家的商品

就卖不出去，就有破产的危险。佛教说人除躯壳外还有灵魂，道教又说灵魂中还有一种叫元神的东西，大概是“灵魂的灵魂”吧。如果说资本是资本家的灵魂，那末在资本家看来，招牌或商标便是他的元神。牌子一倒，等于元神出窍，资本就成了一缕游魂。所以在资本家的竞争中，往往是千方百计把对手的招牌或商标搞垮，或者是假冒有影响的招牌或商标，熟肉店老板们争着用“陆稿荐”这块招牌，便是一例。我们在从前的商标纸上，往往可以看到“注册商标假冒必究”，“新老顾客务必认明某某商标谨防假冒”等字样，正说明了资本竞争的激烈。

这种现象，也从工商界进入了政治领域。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各党各派，五花八门，什么共和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也无非是一种招牌或商标。资本家的招牌或商标上虽然郑重其事地写上“谨防假冒”，但招牌或商标本身往往就意味着一种“假冒”。“陆稿荐”熟肉店那么多，但主人多数并不姓陆，用来烧肉的也决不会是仙人的草席。但是在“陆稿荐”三个赫然大字下，端出一盘热气腾腾的狗肉，肉香中总似乎沾染了一点“仙气”。社会党并不搞社会主义，工党也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关系，但总比明目张胆的“资本家党”要好听一些。党内走资派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流，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自然都深通这种商品交换的生意经，于是纷纷挂出了招牌：“共产党员”是一块，“老革命”是一块，“功劳、苦劳、疲劳”又是一块，红色招牌一挂，就抬高了自己这个商品的身价，向无产阶级卖高价。其实呢，也大抵是假冒或半假冒，有的简直就是陆稿荐老板制造出来的神话，如刘少奇，所谓“老革命”，原来是老叛徒、老工贼。

推而言之，刘、林、邓之流，对于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来说，同样是一种招牌或商标。不久前，就有一些人开了那么一家谣言公司。这家公司的牌子就叫“邓记”。为什么是“邓记”而不是赵记、钱记呢？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本大，牌头硬，有资格充当他们的靠山。谣言公司贩卖的原是卑鄙龌龊的货色，括出邓小平这块“老革命”招牌，大概也可以象陆稿荐的狗肉那样，沾染上一点“革命”气吧。果然邓小平的招牌一竖，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杂沓前来，因为他们知道在这块邓记招牌下，有希望得到他们失去的或是想要得到而未得到的东西。

如此一想，资本家把招牌或商标视作资本的元神，可就有点不确切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击败对手，归根到底还是仗着手中的资本。资本家的假冒行径一旦被揭穿，往往要换一个新商标，新招牌，以图东山再起。这种招牌换记的情况，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常可遇见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帝，反动势力到处寻找新招牌，结果找到了袁世凯，招牌由“清”记改成“袁”记，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丝毫未变。袁世凯一死，反动势力又括出个新招牌，这就是“蒋”记。新中国成立了，反动势力仍然忘不了组织这样或那样的复辟公司。但招牌呢？再用“袁”记、“蒋”记之类自然是无人问津了，这才到党内去找，打出了红色招牌。招牌换来换去，但招牌下面所经营的业务，即招牌所代表的阶级基础，则完全是一回事。

“老谱将不断地袭用，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是真理。

十月革命后阶级关系问题上 的一场论战

石 仑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正确估量阶级关系的变化，是关系革命成败的首要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在怎样看待社会阶级关系，特别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问题上，列宁同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这些机会主义头子展开了尖锐论战。列宁在批判他们的修正主义谬论的同时，对当时的社会各阶级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分析，为无产阶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学习列宁的有关论述，可以使我們更深刻地领会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英明论断的伟大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成了被统治阶级。但是，阶级关系的这种变化，决不意味着阶级斗争的消失，只是标志着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写的《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及时地向全党提出了巩固和发展十月革命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战斗任务。

在阶级关系变化问题上，最先跳出来反对列宁的是臭名昭著的叛徒考茨基。他肆意歪曲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阶级关系，胡说“资本家和大地主因为受到剥夺而不作为一个阶级存在”，所有的人都应该“平等”地生活在“民主”的天堂里，“人人都享有一切政治权利，不管他属于哪个阶级和政党”，妄图通过取消和否认阶级斗争，达到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卑劣目的。列宁无情地揭穿和嘲笑了考茨基的谬论不过是“甜蜜蜜的傻瓜”所蓄意制造的“甜蜜蜜的幻想”。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作为一个阶级依然存在，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某些领域中，甚至比无产阶级还占有更大的优势。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必然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关系变动的一个侧面，是老剥削阶级分子改变了他们的反革命策略。他们深知，“在公开的白卫旗帜下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没有希望了”，不得不乔装打扮，将自己涂上一层苏维埃的“保护”色，戴上一顶“红帽子”，就这样，许多地主富农钻进了国营农场，许多资本家钻进了各种“总局”和“中心”，变成了苏维埃职员，更有许多阶级异己分子钻到苏维埃政府和党的高级职位上来。列宁十分警惕地洞察到阶级敌人反革命策略的变化，指出：“沙皇时代的官僚渐渐转入苏维埃机关，实行官僚主义，装成共产主义者，并且为了更好地往上爬而设法取得俄国共产党的党证，因此把他们赶出了大门，他们又从窗户里钻进来。”（《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这种从打“白旗”到打“红旗”的转变，这种被“赶出了大门”又从“窗户里钻进来”的现象，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新特点。

考茨基之流不仅矢口否认老剥削阶级的存在，而且特别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布哈林胡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由于从工人中培养出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将使新阶级分裂之可能的基础根本破坏”，完全抹煞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会出现阶级分化，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列宁对布哈林的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根据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列宁明确指出：“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这里，列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着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等级差异，这和旧社会差不多，大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就是从这块旧土壤里产生出来的。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耐普曼”分子、投机商人等剥削分子不断出现。他们利用手中握有的货币和商品，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甚至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也搞起了一个黑市买卖的中心据点——苏哈列夫卡广场。这个“苏哈列夫卡”后来虽被封闭了，但列宁认为，封闭一个“苏哈列夫卡”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生产者思想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因为“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总之，小生产每日每时地都在产生着资本主义。布哈林之流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分化的“基础根本破坏”，纯粹是一种脱离现实的机会主义呓语。

由于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即使在从工人中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中，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也同样会分化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列宁指出：“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

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尖锐地指出，一些身居苏维埃要职的共产党员已经成为官僚主义者，“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认为他们是“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论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号召大家必须清除这种敌人。

当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了白匪的叛乱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初步得到了巩固，阶级力量的对比进一步朝着有利于无产阶级方面变化。一九二〇年，布哈林写了《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胡扯“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旧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可能恢复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使任何剥削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列宁驳斥这种“怪论”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者忘记了‘社会阶级关系’”（《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只是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即整个资产阶级都把复辟希望寄托在苏维埃与共产党的“内部的蜕变”。

当时有个叫米留可夫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目睹俄国的地主资产阶级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不堪，颇有感叹地说：在俄国“要恢复资本主义就必须经过社会革命主义和孟什维克主义的阶梯”。另一个流亡国外的老立宪民主党头目乌斯特里雅洛夫，也狂吠只要苏维埃政权产生“内部的蜕变”，那么，“他们一定会走向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应当支持他们。”这些反革命分子的自供，十分清楚地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关系的变化，道出了党内资产阶级复辟势力远远比社会上的更危险、更厉害。列宁十分锐利地看到了米留可夫、乌斯特里雅洛夫供词中反映出的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认为这是“敌人说出了阶级的真话，指出了我们所面临的危险”，并指出：“这是一个主要的真正的危险，因此，对这个问题必须特别加以注意：究竟谁会得胜？”（《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列宁特别强调指出：“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早在一九一八年初，他就对在十月革命前后涌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即他称之为“十月布尔什维克”的，表示不安。事实的发展正如列宁所预料的，十月革命后这批人日益成为整个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那个被老叛徒考茨基吹捧为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领袖”的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前夕混入党内，窃取了党、政、军的一部分权力，成为当时隐藏在党内的最大的走资派。那个在苏联带头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赫鲁晓夫，同样是一个混入党内的“十月布尔什维克”。正是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在斯大林去世后，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葬送了十月革命的成果，做了白匪军、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列宁从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规律的深刻认识出发，谆谆告诫全党必须对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他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论修改党纲》）伟大的列宁在他生前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严厉镇压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筑起了一道又一道防止党内产生新资产阶级的战壕。为了防止党和国家干部搞特殊化以至蜕化变质，列宁认为必须用动员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人。为了防止苏维埃职员的“官僚”化，列宁采取了吸收广大革命群众

参加国家管理的措施，提倡让长期担任苏维埃或党的工作的人到机床和耕犁旁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具体规定担任行政职务的工人每四个月必须回厂劳动一个月。列宁规定党员干部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一般工资，还通过了关于缩小党内物质状况不平衡现象的决议。列宁所采取的种种革命措施，就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打击党内的资产阶级都有重要意义。

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论战，反映了列宁主义与形形色色修正主义的尖锐对立。列宁指出：“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就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布哈林曾公然攻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路线，胡说：“我们整个时期的政策的路线在于有意识地加紧阶级斗争吗？我恰恰不认为必须如此。”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人为制造出来的，他们所奉行的是与列宁主义相对抗的否认阶级斗争为纲的机会主义路线。列宁从世界观的高度揭露这批修正主义者政治上失足的根源，指出他们“否认马克思主义，顽固地不愿（说它不能也许更确切一些）了解在采取任何政治行动之前，必须对各个阶级的力量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严格的客观估计”。（《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们在阶级关系问题上的谬论，充分暴露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可耻叛徒。

伟大的列宁在同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的激烈斗争中，总是不断提醒全党：“阶级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个问题是你们应当在这里研究和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没有停止革命，这是同他对十月革命后的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规律的正确认识分不开的。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下，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可是一次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决不等于修正主义的绝种，只要阶级与阶级斗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就势不可免。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初就曾预言：“我们相信几十年以后，在‘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一定会成长起来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新的和善的调和派考茨基之流”。（《世界政治的转变》）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中国的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就是这样一批新的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这批新老修正主义头子的先后登台，说明了搞修正主义也是后继有人的，只要社会上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一定会长期进行下去。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最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的这一重要指示，深刻总结了国内外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为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一定要在斗争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邓，注意研究与掌握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社会主义农业前进的新步伐

——记彭赵大队的农业专业队

贺 苗 壮

在嘉定县马陆公社彭赵大队，一件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正在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大队在一九七五年前后陆续办起来的七个农业专业队。

农业专业队的深远意义，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将会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但是，从这些专业队一年多来发挥的巨大作用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贫下中农前进的新步伐，看到社会主义大农业光明灿烂的前景。

新形势 新矛盾

当我们来到彭赵大队，在沸腾的田野里，到处可以看到欢唱的农机。据统计，今年三夏，全大队机耕面积达百分之百，机器拔秧百分之四十，机器插秧百分之八十。

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不是只要多添置一些农业机械就行了呢？不。彭赵大队的同志告诉我们，在前几年，这里的机械确实不少，但却有力使不出。贫下中农称之为“管不好，修不起，用不了”。

“管不好”——生产队对农机管理有困难。就拿放农机的房子来说，绝大多数生产队都没有。不少农业机械只能放在露天日晒雨淋，或是放在屋檐下，损坏的很多。贫下中农痛心地说：“老母鸡也要有鸡棚，农机不造机房怎么行呢？”

“修不起”——生产队没有专人搞保养维修。拿到外面修，费用大得惊人。一九七二年，六队的一部手扶拖拉机的修理费用竟达二千多元，可以买一部新拖拉机了。有的生产队实在负担不起，只好坏了就算。

“用不了”——有的生产队一心只想多赚钱，用手扶拖拉机去搞运输，农业生产真正要用时，却又坏了。一九七三年，五队向七队借了一部常年搞运输的拖拉机耕地，刚耕了一

亩半，“内脏”都打坏了，影响了生产。

这些事实使彭赵大队的干部和社员看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随着农业机械化的不断发展，这种相矛盾的一面就日益突出起来。从彭赵的情况来看，现在拥有农业机械的小集体，已经不适应农业机械的进一步推广和使用。要进一步推动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就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由大集体来统一管理和使用农业机械。

一九七四年下半年，农机专业队成立了。大队不但添置了许多过去生产队买不起的农业机械，而且将生产队所有的九台手扶拖拉机也集中到大队，配置专门力量，统一管理使用。

接着，他们又陆续建立了其他的专业队：

大队肥料运输队，负责运输市区垃圾、黑泥、大粪和无名氨水，在大队统一规划下，逐步改造各生产队土质差的土地。

大队种子场，负责培育、保管、供应良种。

排灌专业队，负责修筑地下渠道。

植保专业队，统一防治病虫害。

绿化专业队，抽调八名年老体弱而有种树经验的社员，负责种树、管树。

副业专业队，负责种青饲料和运送饲料，等等。

自从这些专业队建立以后，大队的生产面貌就迅速改观了。

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赵振新对我们算了这样一笔帐：

“我们大队田多劳力少，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要种三亩多土地。一到大忙，农时季节和劳动力的矛盾十分突出。比如早稻插秧要求不过‘芒种’关，但由于农机分散，这里多那里少，总要耽误四、五天农时，平均每亩土地的粮食要少收一、二百斤。成立农机专业队后，农机集中使用，哪一个队需要，就到那里打一场歼灭战，生产进度大大加快了。今年的早稻插秧，在‘芒种’前就完成了。尤其是八队，早稻百分之一百靠机插，比全大队还提前了两天。”

我们来到了大队农机站，地方可真不小。靠西面是一排整整齐齐的机库，大拖、小拖都各有自己的一个机棚。北面是一个修理机器的机房，有三个人在修理着一台插秧机上的汽油发动机。

“农机站里只有你们三个搞修理吗？”我们问。

“不，有十来个。现在大忙，八个同志下去搞修理了。”

“一般的农机修理都自己来吗？”

“那当然。平时，我们把各种不用的农业机械检修好，擦上油，保养起来。逢到农忙，

我们主要是搞抢修。比如这台发动机，汽缸坏了，三个小时前刚送来，现在马上就好了。要是过去到外面去修，至少要三、四天，等到修好，季节也脱了。现在全大队的农机，一直运转正常，发挥的作用可大多了。”

听了彭赵大队同志的介绍，我们想到，生产力的解放，与公有化程度的提高是分不开的。现在人民公社还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有些事光依靠生产队的力量是办不成的，公社和大队两级的经济就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农业专业队的建立，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呢！

新型农业劳动组织的雏形

在大队饲养场，我们看到，小猪在欢蹦乱跳，一只只大肥猪滴溜滚圆。副业专业队负责人老张告诉我们：这是去年下半年专业队成立后带来的新面貌。今年一到四月，全大队养猪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四百多头，上市肉猪的饲养周期从过去的一年半缩减为七、八个月，过去每个饲养员只能养三、四十头，现在养到了六十多头。

“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

老张说，这是因为搞好了分工与协作，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过去生产队养猪，每个饲养员都要各管各地完成养猪的一切工作，顾此失彼，饲养时间长，成本就高，生产队对养猪不感兴趣，说是猪把钱都吃光了。这样猪怎么多得起来？现在办了专业队，饲养员一集中，就可以实行合理的分工，有的管种青饲料，有的管运输，有的管烧猪食，共同协作把猪养好。拿青饲料来说，过去没有专人管理，每逢冬春，总供应不上，猪都饿瘦了，现在全大队的水面都由种青饲料的同志管了起来，有计划地进行种植，饲料就不用愁了。

老张说得很对，分工与协作是辩证的统一。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合理的劳动分工恰恰是加强了劳动者之间的协作，从而产生出新的力量。其实，不仅在一个专业队内部是这样，在各生产队与各专业队之间也是这样。

彭赵大队的同志兴奋地向我们介绍了今年麦子丰收的情况。去年以来虽然雨水很少，可是总产量比去年增加八万斤，平均亩产达到五百斤，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除了路线正确之外，通过专业队的形式对劳动力进行了重新组织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是灌溉。以往麦子种下去后，社员们又要管水，又要管肥，还要搞其他田间管理，一遇干旱，就忙不过来。现在抗旱任务交给了农业专业队，五条吸泥船一起出动，河泥浆象滚滚的原油，从喷管里往外直喷，一浇就是一大片，麦地里一片灰黑，一个月就浇了一万二千多吨泥浆，顺利解决了水和肥的问题。

二是土壤。这里的土壤，晴天硬得象砖头，雨天又烂得象浆糊。其实只要不断拌进城市的垃圾，就能把土壤改造过来。可是各生产队自己的大田作业还忙不过来，哪有劳力到

市区去运垃圾，即使抽几个人去，运回的垃圾也少得可怜。一九七五年运输专业队成立后，改造土壤的任务便包给了他们。这一年共运了二万四千三百吨垃圾，平均每亩土地十二吨，不仅改变了土壤的结构，而且大大增加了土地的肥力。

三是种子。以往，各生产队连种子留种、选种和保管工作也忙不过来，更谈不上组织力量去搞引进和培育新品种了。大队种子队成立后，先后引进了“早熟四十三”、“杨麦一号”等各种高产品种。今年收的小麦，就是“早熟四十三”，生长期短，产量高，抗病能力强。这是大队种子队经过多次试验，摸到了这个品种在本地生长的一些规律，然后在全大队推广的。

其他如农机、植保、副业等等，也都各有分工。但分工又不等于分家，“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社员们虽然是在不同岗位上，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却是一致的。因此，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分工就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一些生产队长深有体会地告诉我们，以往他们从农业到副业，从浇水施肥到灭虫治病，什么事情都得一肩挑，现在许多工作由各个专业队包了去，生产队就可以集中精力搞好田间管理，进一步提高精耕细作的水平，夺取丰收就更有把握了。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早期的工场手工业发展时曾经说过：“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工场手工业的这种发展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但它是加强对工人的压榨为代价的。今天彭赵大队的这种变化，则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农业劳动实行分解和专门化，对农业劳动力进行了新的分组和结合，这同样意味着“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大农业新型劳动组织的雏形。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们专门访问了六队，因为这个穷队翻身的故事吸引着我们。六队的翻身，除了本队社员的共同努力外，大队专业队的支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六队为啥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土地多，劳力少，底子差，平均每个劳动力要经营四亩多土地。因此，精耕细作做不到，基本建设搞不了，只能做到哪里算哪里。虽然六队贫下中农拼命要赶上来，但进展总是不快。

大队各专业队建立后，局面迅速改观。大队种子队就设在六队，抽了三十七亩种子田，劳力由各生产队抽调，工分由大队负责，收益归六队所有，这就大大减轻了六队劳力少的压力。六队除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外，其他都是些喷雾器之类的小型机械。农机专业队建

立后，大拖、小拖、插秧机、割晒机……一台台开了进来，一部插秧机就顶上二、三十个劳动力。六队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建立专业队，大队有什么，我们也有什么了。”

六队政治队长老黄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了他们在大队支援下打的翻身仗：

“一九七五年开春，雨水特别多，而六队三麦的亩产却达到了彭赵大队的第二名。这要感谢一九七四年三秋期间大队组织了一个近三十人的临时开沟专业队，帮我们开了许多又宽又深的明沟，一共开了一千二百多米，平均两亩就有一条。这靠我们自己生产队的力量是绝对办不到的。过去，我们只能开一些浅沟，总共才三百多米。一九七二年，雨水比一九七五年还少，由于沟少，地下水位高，麦根都烂了，亩产只有二百来斤。现在有了沟，雨水再多也不怕了。

“今年麦子又获得了丰收。可是去年三秋，出现了严重的干旱。二百多亩麦子、五十多亩油菜，凭我们那么一点劳力，即使全部出动，日夜不停地浇，五个昼夜也浇不上一遍。正在这时，农机专业队的吸泥船开进了我们六队。没几天，全部麦田、油菜地都灌上了两遍泥浆，既施肥、又抗旱，不几天，绿茵茵的麦苗长出来了。记得喷浆的那几天，许多老人都赶到田头去看，闪着泪花说，这全靠毛主席领导得好，大集体威力大呀。

“排灌队建立后，帮助我们搞了近五百多米长的排、灌两用的地下渠道，把明渠改成了暗渠，排水及时送水快；还有肥料运输队，去年给我们队运的肥料、垃圾比过去我们自己运的增加了近五、六倍。”

老黄说着，给我们拿出了一张表格，上面清晰地写着富队和六队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五年四年中在常年亩产、每人平均分配收入、集体积累等方面的差距。这些数字，记录了专业队建立前后六队与富队差距逐年缩小的过程。如何缩小穷富队的差别？给一些钱，支援一些物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要的。但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穷队的生产条件。大队专业队建立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它在不同程度上铲除了穷富队之间许多生产条件的不平等，例如，大型农机等生产资料大家都有权使用，农田基本建设在大队范围内统一进行，甚至在一定期间劳动力也统一安排使用。六队翻身了，这是专业队结出的丰硕成果之一。

“我们不能光看到自己生产队的利益！”

在彭赵大队，每当大队的拖轮汽笛声一响，我们便听到人们自豪地说：“我们大队的船出发了！”每当拖拉机“突、突、突”地从农机站开出来时，我们又听到人们说：“我们大队的拖拉机耕地去了！”人们不再说我们的生产队怎么怎么，而常常说我们大队如何如何。这些小事表明，在彭赵大队，人们的眼界扩大了，大集体的观念已开始在人们心里形成了。

然而，过去的彭赵并不是这样的。四队的贫下中农告诉我们，过去，他们就曾为了一

条沟，经常与五队吵架。一九七三年，四队与五队在大队的建议下，在两队交界的地方开了一条大明沟，共同用来排灌。当时四队与五队邻沟的土地都是种水稻的，双方矛盾还不尖锐。第二年，五队邻沟的土地种棉花了，矛盾一下就尖锐起来了。五队的棉花是怕水作物，而四队的水稻是喜水作物，又偏偏五队处在沟的上势头，四队处在沟的下势头。五队不需要水，就打开排水口把水放掉。可这一来，四队的稻田得不到水，水稻会枯死，就派人去把排水口堵住，让水流进沟里。这样，五队的棉花又要受影响，就又派人去开排水口。双方各有各的理由，也确实各有各的实际情况。后来还是大队说服了四队在自己土地上重新开挖一条沟，损失了一亩半耕地，才把这个矛盾解决了。

专业队建立起来了。生产方式的改变带来了人们思想面貌的改变；而人们思想面貌的改变，又影响着相互关系的改变。如今的彭赵，共产主义精神到处发扬，“龙江风格”四处可见。

大队农机站建立后，四队队长当上了农机站的插秧机手。去年三夏，五队插秧来不及，大队统一调度，叫四队队长去帮助，四队队长开着自己队的插秧机来到了五队。今年三夏，四队麦子割下来后，运麦的几辆车子凑巧都坏了，五队知道后，立即把自己的车子送到四队。五队要造仓库，缺少一个梁上的三角架，四队了解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准备好造仓库的三角架送给了五队。我们问四队队长，两队关系怎么会发生变化？他说：“我们两个队有好多社员都是大队专业队的人员，他们一接到大队的命令，不管哪个生产队，立即出发。通过亲身的实践，我们两个生产队的社员都感到过去光从自己生产队小集体利益出发看问题，实际上还是陷在小生产的私有观念的圈子里。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目标，我们完全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支援！”

这位只有二十岁的队长的一席话，使我们看到了一代新型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新人正在茁壮成长。

在七队，去年三秋，为了使全大队的土地园田化，需要拿出四亩土地给邻队去种。七队队长一口答应，他说：“我们要搞大农业，就不能再停留在为自己生产队的小农经济的思想境界上。为了搞好园田化，几亩土地算个啥？”

在五队，大队副业组成立后，五队队长想，副业组为我们全大队贫下中农养猪，我不能再光顾自己生产队的利益，就把一年来收藏得好好的水花生种子全部交给了大队副业组。

这类故事，如今在彭赵说也说不完。感谢专业队，给彭赵带来了新的风尚！

当然，大队专业队的产生与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在今天还是一种试验，在前进的道路上，一定还会有更多的艰难曲折。然而，我们深信：“它们还是嫩弱的幼芽，但毕竟不是人工制造的，不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而是社会主义新制度的真正幼芽。”（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上海造船工业十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造船工业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十年的战斗历程。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上海造船工业的面貌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十年前，由于刘少奇一伙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造万吨轮、万匹机确是困难重重。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上海总共只造了一条万吨轮、一台万匹机。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十年，上海就造了四十五条万吨轮、三十四台万匹机。继“风庆”轮扬眉吐气首航欧洲以后，又有十八艘万吨轮远航五大洲、三大洋，为我国远洋航运史谱写了新的篇章。除此而外，还自己设计建造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万吨级挖泥船、巨型浮船坞、海洋调查船、海洋地质勘探船等新型船只。一九七五年，上海船舶建造的总吨位比一九六五年增长四倍多。今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推动下，上海造船工业更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十年巨变，决非偶然。“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上海造船工业迅速发展，正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

上海的造船工业曾经孕育了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解放以后，广大造船工人为了改变我国造船工业的落后面貌，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双手多造船，造大船呵。但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为什么造船工人的愿望总是难以实现？为什么造船工业的发展长期这样缓慢？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上海第一条万吨轮和第一台万匹机的遭遇：一九五八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鼓舞下，江南造船厂的广大工人，以五个半月的时间建造了我国第一条五千吨货轮以后，就决心建造第一条万吨轮。为了使这条万吨轮能装上我国自己制造的主机，沪东造船厂的工人也决心在试制成功两千马力柴油机的基础上，再接再厉试制第一台八千八百二十马力的万匹柴油机。一九六〇年，万吨轮船体只用四十五天的船台周期就胜利下水了。一九六一年，万匹柴油机也开始试车。为了表达工人阶级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心愿，第一条万吨轮决定命名为“东风”。但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正当工人们意气风发地战斗的时候，刘少奇一伙却掀起了一股“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逆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就对“东风”轮开刀了。万匹机质量明明符合标准，但是，那些满脑

褒崇洋迷外的人却借口曲轴上有小沙眼，蛮横无理地宣布这根曲轴报废。工人们气愤地据理力争，但他们根本不听，一定要将曲轴作废料回炉。主机没有曲轴不能运转，“东风”轮没有主机不能远航。就这样，第一条万吨轮在黄浦江里泡了整整五年。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扼杀的仅仅是一条船、一台机吗？不。他们扼杀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扼杀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扼杀的是工人群众的创造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东风”轮才昂首远航；那根被走资派判了“死刑”的曲轴也获得了新生，在万匹机上正常运转了八年。一条船、一台机的遭遇深刻说明：党内走资派和工人群众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文化大革命前造船难，难就难在走资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就难在修正主义路线的桎梏，压制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大造党内走资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夺回了被走资派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改善了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工人群众中蕴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可能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自力更生发展造船工业的道路才越走越宽广。

十年巨变，来之不易。正如工人同志说的：“胜利从斗争中来，胜利后还有斗争”。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造船工业打了十年翻身仗，但与其说是生产仗，不如说是同走资派、同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斗争的政治仗。请看：一九七〇年，在上海船厂工人用三千吨船台造出万吨轮；以及沪东造船厂铸工二十二班工人贴出那张革命大字报以后，上海造船工人向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猛烈开火，并乘胜前进一举拿下了六条万吨轮，创造了年产十三万吨的历史最高纪录。但是，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由于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造船的年产量又分别下降到十万吨和七万八千吨。一九七三年，经过批林整风，广大造船工人坚持前进、反对倒退；批判了那股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潮；这一年船舶吨位又上升到十九万七千吨。一九七四年，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造船工人和广大海员并肩战斗，对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又进行了猛烈的批判，造船产量又提高到二十二万六千吨。一九七五年，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广大造船工人学理论、抓路线，焕发了更大的革命干劲，造船吨位又比一九七四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生产上出现这样一个“高——低——高”的马鞍形说明了什么？说明走资派还在走，两条路线还在斗。斗争的焦点，还是要不要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造船工业的道路。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要独立自主地发展造船工业，就必须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多造船、造大船，把造船工业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工人阶级自己手里。但是，在邓小平一类党内走资派看来，要发展造船工业，就得靠外国，靠进口。邓小平就胡说什么：“要多进口一些东西”，“这样靠得住”。单纯靠进口究竟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这一点，广大造船工人最清楚。有一年，沪东造船厂打算同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买专利的协议，但是外国资本家向我们卖专利，苛刻的附

加条件一大堆，什么每半年要把生产万匹机的情况向他们报告，什么生产专利产品的工厂不能造国产机，什么不能支援亚、非、拉第三世界的国家，等等。这个“不能”那个“不能”，说穿了就是不让我们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加速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我们并不反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引进一定先进技术作为借鉴，但目的是为了增强我国人民自力更生的能力。我们同邓小平这类走资派的分歧，也决不是要不要进口一些必要的技术设备，而是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如果按邓小平所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办事，把什么都放在依靠进口上，这就等于让别人卡着我们的脖子过日子，永远也发展不了我们自己的造船工业。

我们说自力更生，把发展造船工业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个力量最根本的就是工人阶级，就是人民群众。在上海造船工业大打翻身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民群众一旦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那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在三千吨船台上造万吨轮，这在过去从来没有人想过，也没有人做过，但是上海船厂的工人依靠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引路，克服了种种困难和不利条件，硬是在三千吨船台上造出了万吨轮。江南造船厂的工人提出要造万匹机，有人到他们厂里转了一圈，把脑袋摇得象拨郎鼓似地说：“不行，得慢慢来”。但是，工人群众偏不信这个邪。他们狠批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冲破了走资派设置的重重障碍。没有车间厂房，他们就在芦席棚里造；没有设备，就大搞土设备，来个土洋结合；没有材料，就依靠群众大挖潜力。在兄弟厂的支援下，到底在“芦席棚里飞出了金凤凰”，造出了第一台万匹机。中华造船厂是一个中型船厂，造船工业翻身仗打响后，这个厂的工人也豪迈地提出：“我们要造万吨轮！”这时有的人就说：“连个万吨船台都没有，造什么万吨轮，还是等一等吧。”但是，工人同志回答说：“不对，干革命就是要争，不能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是要争，等是等不出什么东西来的。”没有条件吗？工人同志说：“条件是人创造的，等到把条件弄得妥妥贴贴再造万吨轮，还叫什么革命，还要我们工人阶级一双手干什么！”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正是在这种可贵的革命精神鼓舞下，工人们在一个改装过的土船台上，连续造出了六条万吨轮。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沪东造船厂的工人刚刚奋战九十天，把“长锦”、“长绣”号万吨轮同月推下水，接着，他们又马不停蹄，在船台上摆开了大战“徐州”轮的战场。仅仅五十余天，就把这条二万五千吨货轮推下了水。在大战“徐州”轮中，群众中涌现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啊！就拿焊接“徐州”轮主攻小组之一的“雄鹰”班七个青年来说吧，他们向厂里另一个青年突击队“猛虎”班学习，把铺盖搬进厂里，日夜奋战在“徐州”轮上。有一次，他们连续一天一夜攻下三〇一段后，又突然接到要在一夜里攻下一〇二分段的焊接任务。青年们连焊枪都没放，就把“雄鹰”的战旗插上一〇二段。在狭小的舱室里，在滚滚的浓烟中，他们连续战斗了四十个小时，按时完成了焊接任务。在这样大干的日子里，“雄鹰”班的青年一刻也没有忘记学习和批判。一个半月的时间，他们就学习了《哥达纲领

批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出了四期大批判专栏和黑板报，真正成为一支政治上、生产上的突击队。象“雄鹰”班这样动人的事迹，无论在哪个船厂、哪个车间，无论在退休老工人和广大基层干部中，可以说比比皆是，写也写不完。马克思早就说过：“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哲学的贫困》）广大工人群众总是要革命、要前进的。群众中蕴藏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正是我们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力量源泉。只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么，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是不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对待工人群众创造的新生事物抱什么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上海造船工业十年来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有些人对我们自己制造的万吨轮、万匹机，就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放心。到一九七三年，全市造了二十多条万吨轮，有的多次经过十级左右风浪的考验，有的连续安全航行一万多海里，有的重载试航一百二十多小时，证明质量都符合标准。但有些人总是千方百计挑毛病、找岔子，说什么“这些船质量不可靠”，“只能放在黄浦江里当摆渡船”。“庆阳”号的主机，有人攻击说是“心脏衰弱，四肢无力，耳目不灵”，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可事实怎样呢？它远航地中海，航程一万八千海里，主机连续正常运转十六昼夜，证明性能完全合格。总之，这些人对待新生事物的逻辑是：不合法，不科学，不承认。这三个“不”，实际上是一个“不”，不准革命。明明有些船国内能造，偏偏不准造；明明可以跑远洋，偏偏只准跑沿海；明明可以交付使用，却偏要故意拖延。工人同志气愤地说：“造船流了千身汗，交船要过万重关。”在这场关系到前进还是倒退的斗争中，广大造船工人乘着批林批孔运动的东风，向林彪、孔老二鼓吹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向崇洋迷外的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迎头痛击了这股复辟倒退的逆流，终于又一次夺得了国产轮的制造权、远航权。斗争实践进一步使大家看清了，资产阶级要破坏和反对造船工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往往首先从否定新生事物开始。他们或者造谣诬蔑，咒骂攻击新生事物，或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把新生事物一笔抹杀。“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列宁：《伟大的创举》）

任何新生事物在开始时总是不完善的。列宁在谈到应当怎样正确对待这种不完善时，曾经举过一个生动的例子：“据说，最先发明的那架蒸气机也是不好的，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动过。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已经有了这种发明。纵然头一架蒸气机从外形来看是不适用的，可是现在却有了火车头。”（《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1922年3月27日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这就告诉我们，新生事物的成长总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国产轮也是这样。事实上，正是广大工人群众，不但满腔热情地造出了国产轮，而且以十分积极的态度克服了许多前进中的问题。就拿沪东造船厂工人制造万匹机来说吧，十年来，他们总是认真对待每一个质量问题。万匹机有个重要部件叫“十字头轴承”，不少

进口的所谓名牌柴油机；这个部件常常因为经受不了压力而发生龟裂。工人们不相信国外解决不了的就是那么难以解决。为了避免加工过程中遇到外界某些震动而影响质量，工人们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进行加工，努力使质量超过国际水平。万匹机的“人心骨”曲轴；长达十一米；安装时为了保证质量；不让尘粒沾上机座，在闷热的夏天；工人们把车间所有的通风设备都关闭；宁愿在四十多度的气温下进行操作。万匹机上控制倒顺车的“差动机构”；开始的时候质量不稳定，有人说它是“不动不差，一动就差”，三结合小组先后进行了一千二百多次试验，使质量不断有了提高。因此，不允许国产轮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说到底；还是不允许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造船工业。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反映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上海造船工业的蓬勃发展，正是各行各业共同战斗的结果。当上海船厂在三千吨船台上造第二条“风雷”号时；有的人不给钢材；上钢三厂的工人知道后；立即伸出援助的手，千方百计为他们搞到了造船用的厚钢板。当江南造船厂工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贴出那张《是远洋公司，还是崇洋公司？》的大字报后；首先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的；正是远洋公司的广大海员群众。国产轮装上了国产万匹机；有人吹冷风，又是广大船员以实际行动支持了造船工人。“风光”轮第一次远航，船员们就记录了十万字的技术资料；为上海船厂改进万匹机提供了宝贵的依据。沪东造船厂造万匹机；有人非要把机上的国产大链条换上进口的；大隆机器厂的工人挺身而出，克服了种种困难，立即打出了高质量大链条。中华造船厂为了提前完成“风歌”号交船任务；决心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这时，江南造船厂、沪东造船厂、港口机械厂、航海仪器厂等单位的工人群众发扬“龙江风格”；主动参战。工人们豪迈地说：“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为了尽快发展造船工业，我们要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这些生动的事例充分说明；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他们所鼓吹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不得人心。因为他们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压迫的是整个工人阶级；因此，工人阶级也必须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同他们作斗争；才能不断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上海造船工业的十年，是战斗的十年，胜利的十年。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崇洋迷外的思想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留下来的破烂货；只要社会上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反映在要不要走自力更生道路问题上的斗争；就不会停止。因此，我们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本刊通讯员 本刊记者

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靳 柏 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造船工业迅猛发展，万吨巨轮远航海外，宣判了邓小平鼓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的彻底破产。我们不由想起了一百年前李鸿章所经营的那家轮船招商局。因为从李鸿章这个近代洋奴身上，可以照见邓小平这个当代洋奴的丑恶嘴脸。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头子，他们推行洋务运动的口号是“自强”和“求富”。但是，只要看一看这个轮船招商局，就不难看清他们口中的“自强”和“求富”是些什么货色了。

轮船招商局并不制造轮船，而是一家经营航运业务的轮船股份公司。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攫夺了我国沿海航行与内河航行专有权，什么美商旗昌洋行、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航运业务。有的年分，从上海到武汉往返一次，每吨所收的运费就高达四十余两银子。李鸿章看得十分眼红。按照他的“洋务”逻辑，要“自强”，就要办军事工业；办工业，就要靠“引进”西方制造洋枪洋炮的技术装备；要“引进”，就要有钱，就要“求富”。经营航运业，看来是一个“求富”的好机会。而中国商人手中又有一定数量的资金，也对航运业发生了兴趣。于是李鸿章设计了一个“官督商办”的方案，由清朝政府出面，招集股本，得到商股银四十七万多两，又从官款中拨出一百三十多万两，作为资本，在一八七二年十二月成立了这家轮船招商局。

招商局自始至终积极奉行李鸿章“造船不如买船”的方针。一八七二年，它从英国高价买进了伊敦、福星、永清三条船。一八七七年，又在李鸿章授意下，买进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十八条船和一些码头、栈房设备，构成招商局产业的基础。招商局拥有轮船最多时共有三十三条，除八条小船是从福州船政局领雇来装点门面外，其余都是买来的洋船。这些船，连李鸿章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是“年久朽敝”的破烂货，买价既高，使用期又短，没几年就只好改为趸船，或拆卸机器，“以备修配他船”。李鸿章只能自我解嘲地说，“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物料，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这虽是李鸿章的“造船不如买船”的辩护词，但正好道破了洋务运动的真相。就拿洋务派举办的福州船政局来说，从一八六八年开工到一八七四年六年间，共造船十五条，所用的机器装备全部是通过船政局总监督、法国人日意格从法国进口的，东西又旧又

破，价钱高得吓人，原定经费三百万两，实际开支却高达五百多万两。李鸿章所说的造船和买船“略同”，表明了洋务运动的卖国投降主义路线下，所谓“造船”，只是“引进”一些洋匠洋机器到中国来装配一下，这样自然不如干脆从外国“引进”整条船只，还要简便得多。说穿了，都是要把中国经济束缚在外国资本主义的裤腰带上。

有了洋船，自然得请洋人来开。“不惜重资购求洋匠”，就是李鸿章为招商局定下的用人政策。招商局“各船主(船长)、大副、二副、大车、二车皆洋人”，成了洋人的天下。这些“重资购求”来的“洋专家”们，大多不学无术，招摇撞骗，“非赌博宿娼，即酗酒躲懒，行船则掉以轻心”。一会儿，伊敦号在大沽遇风翻没，一会儿，福星号在黑水洋被英船撞沉，最严重时，五天内连沉两船。一八七七年后的十七年中，失事船只共达九条，占招商局轮船总数四分之一强。但李鸿章仍对这些假专家奉若神明，不仅不追究责任，而且继续付给高额薪金。甚至连栈房总管也要重价聘请洋人担任。一八九三年有人揭发：“上海北栈洋人海利司，利欲熏心，却不识栈事，又复任意妄为，货栈栈租，往年可收三十万金，去年只收三万金”。钱哪里去了？还不是进了洋总管的腰包！

一味迷信洋专家，势必贬斥本国航运人材。尽管李鸿章也办了些什么学堂，说过：“军政船政，直视身心性命之学”的大话，但在他心目中，中国事事不如洋人。船是外国的好，技术也是洋人高。中国技术人员不行，“质量不高”，不能进招商局开船管机器。吴淞商船学校毕业生曾到招商局船上实习，处处受刁难排挤，对不上号，站不住脚。到一九〇八年，招商局一百七十五名船长、机械士中还是没有一个人。崇洋迷外，堵塞了培养本国航运人材的道路。

李鸿章推行的这条卖国投降路线，究竟是“强”了谁，“富”了谁呢？向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买船十八条的事就很说明问题。招商局为买这些船，付出了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的高价。李鸿章竟称之为干了一件“千百年创见之事”，说是招商局“转弱为强之始”，着实得意了一番。其实，这些船只都是旗昌公司用了多年、行将报废的，遇上李鸿章这个“洋迷”，便索性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当时就有人说，旗昌公司抛出这些破船，就好比“丢掉了一件破衣裳，以卖得的高价，另做一件合适的新衣”。招商局高价买进后，有的船根本不能用，有两条只好改作趸船，还有两条只能把机器拆下来备用。李鸿章买来这样一堆废铜烂铁，以中国人民的血汗，填饱了外国资本家的腰包，居然还有脸大肆吹嘘，其无耻也真是到了“千百年创见”的地步。

招商局大买洋船，资金发生了问题，就只好靠向外国资本家借债过日子。一八七七年买旗昌公司的轮船，一下子就借债一百二十万两，加上前几年借欠的，共达四百零三万二千两，相当于当年实收资本额七十五万两的五倍半。一八八五年，又向英商汇丰银行借债三十万英镑，折合上海海关两共一百八十八万零三百八十八两。到清朝末年，招商局洋债总额高达四百六十多万两，大大超过了它的资本总额。外国资本家当然不会白白借钱给别人。

到后来，招商局的总、分局等十五处的一切基地、房产、码头、全部轮船和运费收入，都成了汇丰银行的抵押品。根据契约，只要招商局支付借款的利息过期十五天，汇丰银行就可以对招商局的抵押财产实行拍卖或出租。招商局实际上已成了帝国主义的囊中物了。

尽管如此，外国资本主义仍然千方百计要把招商局压倒挤垮。招商局成立初，李鸿章还想搞些海外航运，捞一些外快。但外国资本家的禁脔岂能容得他人染指。一八七九年，招商局和众号轮船曾经试航檀香山、旧金山等地，被美国海关无理扣留，勒索了一笔巨款，吓得李鸿章从此再也不敢派轮船出去了。在国内航运上，英商太古和怡和两家洋行联合起来，以压低运价的办法，向招商局进逼。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也曾经叫嚷过“专为抵制洋轮”的调调，但那只是发生在主子 and 奴才之间的一场不痛不痒的争斗。“抵制”的结果，是李鸿章同这两家洋行订立卖国的“齐价合同”，用拍卖国家航运主权的办法来一个夹缝中求生。按照这个合同，由招商局、太古、怡和三家在各条主要航线上共同议订统一的运价。对内部，它规定三方的货源分配、运费收入、船数、吨数，都得按一定的比例，招商局不得单独行事；发生争议，须由“洋商局董决断”。对外，它规定三方用联合降价的办法打击在同一条航线上营业的其他轮船公司。按照这个合同，洋大人成了我国内河和沿海航运的霸主，招商局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业务，而中国民族资本的轮船公司就此丧失了长江和沿海营业的可能性。合同签订之后，招商局不仅“悉受洋商操纵”，而且轮船数量减少，怡和、太古洋行的轮船则成倍增加。一八七七年，招商局有船三十三条，总吨位二万三千九百多吨；太古只有五条，总吨位八千三百多吨。到一八九三年，招商局下降为二十六条，总吨位二万三千二百余吨；而太古则上升为二十九条，总吨位三万五千余吨。到十九世纪末，侵入我国长江航线的帝国主义轮船公司除太古、怡和外又增加了四家，而中国方面没有一家新的轮船公司出现。无怪那些与李鸿章关系较深的人也会指责他搞“齐价合同”是“但能压制华商，不能遏制外人”，“自锄同类，背道而驶”。连吹捧“齐价合同”最起劲的洋奴汉奸盛宣怀也不得不招认：“今商局在长江及福州、宁波（等线）皆吃亏了”，“长江一线，怡和近年确占招商局便宜十之七。”这些话，虽然都是奴才因为主子分给残羹不够多而发出的怨言，但也足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李鸿章这一类卖国投降的洋务派的可耻面目。

从轮船招商局这个典型可以看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推行的卖国投降路线给近代中国带来的决不是什么“富”和“强”，而是把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李鸿章的名字，早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他的阴魂仍在游荡。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李鸿章洋奴哲学的狂热鼓吹者。依了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轮船招商局这类洋奴哲学的黑标本就会在中国土地上重新出现。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夺取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更大胜利。

关于茶盘生产的一场 争论说明了什么？

编者按：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商品制度还存在，商品的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也仍然存在。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一个工厂企业的生产，究竟是为了使用价值，即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还是象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单纯为了追求商品的价值，是关系到工厂企业所有制性质的问题。因此，对于在社会主义生产和交换中还存在着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上海工业玻璃五厂党支部就这个问题，发动群众，学习理论，深入批邓，这种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值得提倡。

编辑同志：

我们是一家历来只生产集光镜等工业玻璃制品的工厂。不久前，上级公司要我们在保证原有生产任务的前提下，生产一批市场急需的玻璃茶盘。这个任务要不要接？在群众中发生了一场争论。

一种意见认为，不能接。理由是这种生活费工多，产值低，吃力不讨好。但大多数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社会主义工厂，应当想人民所想，急国家所急，主张把任务接下来。

从表面上看，这场争论只是一个生产问题。但是我们学习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后，就感到这不仅仅是个生产问题。为了把这场争论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我们把争论的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是什么？第二，怎样看待在现阶段还起作用的产值指标？第三，产值是否是衡量一个工厂好坏的唯一标准？随后再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学习理论，深入批邓。从而使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

对于社会主义工厂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大家认为，这是区别社会主义工厂同资本主义工厂的重要标志。许多老工人在讨论中谈到，解放前，资本家开厂就是为了赚钱。赚钱多的生活就拚命做，赚不到钱的，即使劳动人民再需要，他们也不干。比如金鱼缸，地主、资产阶级老爷们出得起高价，资本家就大量生产。为了多赚钱，还经常弄虚作假，在金鱼缸

缸口上镶一圈金沙料的花边，价钱就要提高一倍。因此，资本家有句口头禅，叫做“千做万做，蚀本生意勿做”。但是，我们社会主义企业，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这就决定了：调节社会主义企业生产的，不是利润的大小，而是国家的计划和人民的需要。确实，如果单纯从经济上来看，生产茶盘的劳动力比生产集光镜要多五倍，每班产值要少一千九百元。但是从政治上来看，即使困难再多、利润再少，只要是人民的需要，也应该生产。否则，“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社会主义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究竟还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如何看待现阶段还起作用的产值、利润？大家感到，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的，由于社会主义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体现资产阶级法权的商品制度、等价交换、价值规律等等，实际上还在起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必须利用产值、利润，作为衡量一个企业生产发展情况的一个标志。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企业，也应当努力完成国家下达的产值指标。但是，从商品的两重性来看，产值并不体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实际上只有使用价值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如果一个工厂企业片面追求产值、利润，那就是扩大了这方面的资产阶级法权。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是这样逐步改变社会主义工厂企业的性质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教导，不断批判“产值挂帅、利润挂帅”的错误思想，堵死这个资本主义复活的途径。

对于第三个问题，大家感到，上面两个问题能够正确理解了，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产值、利润是衡量一个工厂好坏的一个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更不是主要的标准。否则，不是变成“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了吗？大家在讨论中就谈到，实际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产值完成得不错，但是方向路线不对。比如，在接受任务时，总是拣费力少、产值高的产品，也就是所谓抢“蹄胖”吃；在和别的工厂企业的关系上，常常扯皮踢脚，以邻为壑，缺少“龙江风格”；在协作中，不是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而是采取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即所谓有来有去；甚至为了追求产值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偷工减料。这就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侵蚀了社会主义的经济领域。因此，大家认为，看一个工厂企业的好坏，最根本的就是要看方向，看路线，看风格。“路线对了头，一步一层楼”，生产也必然能搞上去。

关于茶盘生产的这场争论，有的同志也认为是“小题大作”。但我们认为，事情虽小，却包含着能否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来办好社会主义的企业，能否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的大问题。同时，大家在讨论中也谈到，这种“以小见大”的类似现象，在其他工厂企业也存在。因此，我们写这样一封信，以引起重视和讨论，进一步把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深入下去。

致

革命敬礼！

上海工业玻璃五厂党支部

一九七六年六月

爱国词人辛弃疾

高 义 龙

一一六一年秋天，辽阔的中原大地燃烧着漫天烽火。女真奴隶主贵族头子完颜亮亲率六十万大军，渡过淮水，大举南犯。金占区的人民，纷纷举起义旗，在敌人后方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武装反抗。

在济南南部连绵起伏的群山中，有一支二千来人的队伍正沿着蜿蜒的山路向泰山行进。为首的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英俊青年，长方脸，宽肩膀，身材魁梧，目光炯炯。这个青年，就是南宋时期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词人——辛弃疾。

走上抗金前线

辛弃疾，字幼安，一一四〇年五月十一日出生于山东济南四风闸。当时，北中国已由南宋统治集团拱手送给了金廷。在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蹄践踏下，辛弃疾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深重的民族灾难，北方人民前仆后继的抗金斗争，在年轻的辛弃疾心中激发起报仇雪耻、收复山河的雄心壮志。一一六一年，他在济南南部山区组织了一支武装，与民族敌人展开英勇搏斗。不久，他听说耿京的义军在泰山周围接连打败金人，攻克了莱芜和泰安两个县城，为了集中抗敌的力量，便主动带着队伍去投归。

耿京是济南郊区的一个农民。他率众起义后，自称“天平军节度使”，义军迅速地发展到二十五万人。辛弃疾来到这支义军后，被委任为“掌书记”，负责起草书檄文告，保管印信。随着这支队伍的扩大，周围的许多支抗金武装也纷纷前来联络，有的带兵参加，有的表示愿受节制。辛弃疾以前曾结识一个叫义端的和尚。这个和尚不爱读佛经却喜欢读兵书，谈起古代的战事来头头是道，这时也拉起了一支千把人的队伍，挂出了反金的旗号。辛弃疾虽然嫌他油嘴滑舌，言过其实，可是为了壮大耿京义军的力量，便说服义端带着他那支队伍来归。

义端参加耿京的义军后，本想弄个头儿显显威风，然而等了一天又一天，却依然毫无声息。他便在辛弃疾面前挑拨说：“以你这样的学识，却甘心低头在一个农夫手下讨生活，

好不委屈呀！”辛弃疾却回答：“大丈夫应以社稷安危为重，现在义军声势日振，我个人谈得上什么委屈不委屈？”义端眨眨眼睛说：“听说贵同窗党怀英已在金国作了官，眼看指日飞黄腾达，你与他向有‘辛、党’之称，不知对此有何想法？”辛弃疾正色道：“认贼作父，卖身求荣，我视之如粪土！”义端见话不投机，赶忙转过口风说：“辛相公胸有大志，满怀忠烈，可敬可敬！来日平步青云，可不要忘掉提挈故交呵！”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生出一条毒计。

一天夜晚，辛弃疾到耿京那里去商谈军务。义端乘辛弃疾不在，偷偷地钻进他的营帐，将他保管的义军印信窃走。辛弃疾回来正要起草檄文，发现大印失窃，马上向耿京报告。耿京大惊，连忙查问。岗哨说今晚曾见义端来过，因他与辛弃疾是故交，所以进出都没有盘查。再找义端，已不见踪影。耿京十分震怒，辛弃疾也心如火焚。这时耿京旁边有个叫邵进的小头领瞪着两只老鼠眼，气势汹汹地对着辛弃疾说：“义端是你荐引进来的，他窃印逃走，定是出于你的指使。窃去帅印，理当军法从事！”说着“嗖”地一声拔出刀来。辛弃疾强捺住内心的激动，从容地对耿京说：“义端窃印，肯定去投奔金人。这一带方圆数百里，都是义军地面，谅他逃也逃不远，请给我三天时限，将他追获。不获，就死未晚！”耿京想到辛弃疾到义军里以后一直忠心耿耿，便拦住了邵进，给了辛弃疾三天的期限。

辛弃疾连忙跨上骏马，翻过山梁，越过山涧，在丛山里用敏锐的目光搜索着。拂晓前，他看到前面有一个黑影在跌跌撞撞地赶路，于是挥鞭策马，追上前去，大喊一声：“站住！”这声音在月色笼罩下的整个山谷里回响。前面的黑影正是义端。他一听声音，便知道是辛弃疾追来了，吓得浑身发抖，急忙向着一个山坡滑下去。辛弃疾赶紧从马背上跳下，一下跃到义端身后，抓住他的衣领，把他摔倒在地。义端一个翻身，跪在地下，对着辛弃疾连连磕头道：“呵呵，你的脸色真吓人，象青牛一样；你的力气真大，能杀人。看在过去交情的份上，请饶我一条命！”辛弃疾两眼喷射着怒火，大喝一声：“叛贼！”刀起头落，将义端砍翻在地。

天亮了。辛弃疾提着义端的首级和义军的印信，回到了耿京营中。耿京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样的！真是下马能草檄，上马能杀贼呵！”辛弃疾把印信交还耿京，耿京说：“还是由你保管吧！”从此，辛弃疾更进一步得到了耿京和广大义军的信任和器重。

闯金营生擒叛徒

一一六一年冬天，金占区到处张贴着“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的布告。当时，完颜亮在长江北岸被部下杀死，金国的辽阳留守完颜雍自立为帝，对各地义军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办法，在义军内部也激起了层层波澜。有些不坚定的人开小差走了。邵进则经常在耿京面前噤噤喳喳：“躲在这山沟沟里能搞出什么名堂？如今咱们人多势众，还愁换不来高官厚禄？”耿京虽然斥责了他，但内心却十分郁闷。辛弃疾也很忧虑。他听着各个军营里接连不断的悲壮的号角声，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这支在血战中壮大的义军，怎样才能继续发挥抗击金兵的作用呢？又怎样才能稳定住呈现出涣散朕兆的军心呢？受到封建

正统观念束缚的辛弃疾在这时向耿京提出：应当立即与南宋朝廷取得联系，以便作战时互相配合，失利时可将全军调往南宋境内。耿京同意了这个建议，便让辛弃疾起草章表，并派人与附近的义军首领王世隆、张安国商量，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一一六二年元月中旬，耿京派遣他的副手贾瑞为义军代表，由辛弃疾陪同到达建康（今南京），当天就被宋高宗赵构引见。宋廷正式授耿京天平军节度使，授贾瑞敦武郎，授辛弃疾右承务郎。辛弃疾等兴冲冲地离开建康，北返抗金前线。

到了海州，辛弃疾等先到王世隆的营帐里，兴奋地对他谈着与宋廷交涉的情况。但是王世隆却一语不发，脸色阴沉。辛弃疾诧异地问道：“怎么啦？”王世隆说：“耿京已经再也见不到了！”辛弃疾大惊失色，站起来问：“你说什么？”王世隆告诉他，在金人的引诱下，张安国勾结邵进，杀害了耿京，投敌去了！辛弃疾把拳头往桌上猛击，问：“张安国现在在什么地方？”王世隆说：“他当官了！杀死耿京，金人封他作了济州的太守。”辛弃疾又问：“我们的义军呢？”王世隆说：“有几万人被张安国裹胁而去，其余的大部分都散掉了。”辛弃疾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对贾瑞、王世隆说：“走！”王世隆问：“哪里去？”辛弃疾说：“不杀张安国，誓不生还！”王世隆说：“张安国在济州金人营寨，有五万多人哪！”辛弃疾说：“你给我五十名骑兵，我一定突入金营将张安国擒来！”王世隆被他这种舍生忘死的气概所感动，遂约集附近义军，带着五十名精锐的骑兵，同辛弃疾直奔济州。

张安国用耿京的头颅为自己换来个官职后，日日设筵，与金军将领饮酒作乐。夜晚，辛弃疾等一行人马突然来到金营，出其不意地砍倒了门卫，长驱直入。邵进远远看到，连忙去向张安国报告。张安国半睁着惺忪的双眼说：“胡说！你喝醉酒了，在讲胡话！”辛弃疾已经南归，怎么会到这儿来？”正说着，辛弃疾已经骑马来到门口，纵身进门。邵进和金将正要抽刀反抗，已被辛弃疾砍倒在地。张安国酒也吓醒了，直楞楞地望着辛弃疾。辛弃疾不容分说，一把将他抓起，苍鹰搏兔似地把他缚在马上。这时，贾瑞、王世隆已分别召集了被裹胁来的义军，号召他们反正。这些义军跟着辛弃疾冲出金营，向南而去。金兵失了主将，吓得蒙头转向，营内一片混乱，等他们定下神来整顿队伍要追赶时，辛弃疾已带着万余人马，在月光下消失在南边的天际了。

辛弃疾带着队伍，日夜兼程，不顾饥渴劳累来到了长江北岸。渡江之后，他把叛徒张安国交给宋廷审判处死。辛弃疾这段英勇抗金的斗争经历，对他后来坚持爱国、反对投降的一系列主张和文学创作有重大的影响。他曾亲自参加过金戈铁马的战斗，在抗金的前线冲锋陷阵，较深切地了解中原人民所受的苦难，了解北方的地形地势和金人的弱点，了解投降路线的危害，因此毕生坚决主张抗战，并通过自己的诗词创作抒发真挚的爱国感情，怒斥投降派的卖国罪行。以后他曾在不少词中自豪地回忆起这段经历，直到晚年，他“追念少年时事”还这样写道：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jī纪)渡江初。燕兵夜娖(chuò 辇)银胡觥(hū 禄)，汉箭朝飞金仆姑。

“马革裹尸当自誓”

辛弃疾到南宋后，从此便定居下来。

这时，朝廷上正爆发了一场主战与主和的争论。一一六二年六月，赵构让位给过继儿子赵昚(shèn 甚)，就是后来的孝宗。赵昚于次年改号“隆兴”元年，即位之初，很想作一番事业。他任命主战派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两路军务。五月下诏北伐，战事最初颇为顺利。在攻下宿州后，李显忠、邵宏渊这两个宋军将领为库藏的分配问题发生了争执，各不相下。不久，当女真大军杀来时，李显忠要邵支援，邵却说：“天气这么热，摇扇子乘风凉还来不及，那能再披铁甲上阵打仗。”结果宋军在符离大败。八月进行议和，南宋全部接受了金人的要求，对金称侄，割四州，献岁币。十天的北伐，换来的是一纸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和约。“隆兴和议”后，丞相汤思退大骂主战派“误国以邀美名”；户部侍郎钱进礼搬出孔孟的老调子，大讲“兵者凶器，愿以符离之败为戒，早决国是”。大地主投降派气焰嚣张，朝政全在他们的操纵之下。

辛弃疾从小在女真奴隶主贵族的铁蹄蹂躏下过活，对于“中原父老望旌旗”的心情有深切的体会。一一六五年，他不顾官卑职微，挺身而出，痛切陈词，写了《御戎十论》，总结了历史上商鞅、刘邦、曹操、孙权、唐太宗、赵匡胤等政治、军事方面的经验，具体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指出金国虽然地广、财多、兵众，但这都是表面现象，南宋政府只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采取正确的措施，一定能收复失地，打败敌人。辛弃疾针锋相对地驳斥了投降派的卖国论调，要求朝廷改变政策，振作斗志。然而，南宋统治集团却无动于衷，不加理睬，一一六八年又把他调到建康去担任“通判”。

建康，是位于战略要地的古城。这里设有行宫留守、军马钱粮总领所，集中了一批高级军政官员。辛弃疾没有参与军政大计的机会，只得把满腔爱国热忱尽情倾吐在他的诗词中。在为江南东路计度转运副使赵彦端祝寿时，他激情飞越地写道：“闻道清都帝所，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在行宫留守史正志的宴会上，他慷慨激昂地即席赋道：“袖里珍奇光十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且归来，谈笑护长江，波澄碧。”然而，醇酒美饌，唱和酬答，徒然增添了他胸中壮志难伸的苦闷。他多次登上秦淮河畔的赏心亭，极目远眺，遥望大江上片帆西去，不禁想起了晋朝的谢安、谢玄，沉郁地吟咏：“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后来，曾于一一六一年在采石之战中打败过完颜亮的虞允文担任了宰相。辛弃疾又接连写了《九议》、《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和《议练民兵守淮疏》呈上去，其中除重申了《御戎十论》中的见解外，又着重提出：不要因小胜而骄，因小败而沮，重要的是从各方面作好充分的北伐准备。但是，这些主张和《御戎十论》一样，最后都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一一七二年春，辛弃疾被调到滁州担任知州。滁州地处淮南，是战略重镇。辛弃疾一到这里，只见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城郭荡然成墟，听不到鸡鸣犬吠，看不到过往行旅。虽然“隆兴和议”以来已经八年没有战事了，但是南宋政府一直苟且图安，把兴复工作丢在

一旁。

辛弃疾上任后，集中精力把滁州重建成守土要塞。他考虑到当地连遭战祸与天灾的困难处境，豁免了民户历年积欠的赋税五百八十万钱（合五千八百贯）；他想方设法招徕流亡外地的民户回乡，贷款给他们垦殖荒地，建造房屋，又招集从金占区逃至两淮的流散难民，分拨给一些土地、农具，屯田耕垦，将壮年男子编为民兵，于农闲时加以教练。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又恰值该年风调雨顺，夏麦丰收，滁州的面貌有很大改变。辛弃疾登上新建造的“奠枕楼”，看着征埃成阵，行客络绎的景象，高兴地写道：“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在滁州任职两年后，辛弃疾又先后被调到建康、临安、隆兴、襄阳、江陵等地。尽管大地主投降派不断对他进行压制和排斥，但他并不灰心，仍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和爱国将领自励。一一七七年，辛弃疾在江陵任职时，看着滚滚东流的汉水，想起西汉时抗击匈奴的飞将军李广，想起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曹操，想起西征乌桓的名将马援，豪迈地写了一首《满江红》：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
贯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

腰间剑，聊谈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马革裹尸当自
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记取楚楼风，裴台月。

创建“飞虎军”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南宋小朝廷过着醉生梦死、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南方人民不但要负担南宋的全部税赋徭役和军队粮饷，还要负担每年向金国缴纳的巨额岁币。因此，江南地区的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武装暴动此起彼伏。辛弃疾为其地主阶级立场所决定，曾参与了南宋政府对江西茶商起义的镇压。但是，他在这段期间也常常思索着一个问题：“老百姓为什么去做‘盗贼’呢？”

一一七九年，辛弃疾在转任湖南转运副使后，向朝廷递上了一份著名的《论盗贼札子》。他直率地指出：老百姓为盗，都是官府苛征暴敛所造成的。他要求皇帝深思致“盗”的原因，革新政治，授他以惩处贪官污吏之权。但是，这一下可大大触怒了当时的南宋统治集团。赵昀看了这份奏疏后十分恼火，亲笔批道：“官吏贪求，自有常宪，何必大惊小怪！”辛弃疾又碰了个钉子，接着被调往潭州。

在潭州，辛弃疾看到当地的豪门世族都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平日鱼肉百姓，无恶不作。他就下令严加整顿，取缔的取缔，解散的解散。同时，为了加强防御金人的军事力量，于一一八〇年夏天奏请在湖南创立“飞虎军”，隶属枢密院和御前步军司，直接由湖南安抚使节制。当年秋天，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辛弃疾马上着手行动。他召集了步军二千人，马军五百人，严加操练。他又派人到广西用五万缗钱买了战马五百匹。在长沙，辛弃疾决定利用五代十国时期马殷遗留下来的营垒故基，修建“飞虎军”的营栅。这桩事触犯了当地地

方士绅的利益，他们想出了各种理由来反对。辛弃疾听到这些风声，不仅没有丝毫动摇，却反而加紧了营栅的修建。

时逢秋天，阴雨连绵不断，营房的修建工作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辛弃疾督促监办，监办只得愁眉苦脸地说：“老天不帮忙，没法烧瓦呀！”辛弃疾问：“需要多少瓦？”“要二十万”。辛弃疾看着窗外沉吟了半晌，最后下决心说：“不用着急。让长沙每户居民缴二十片檐前瓦，各付给瓦价一百文，限二日内以瓦收钱。”这道命令一传下去，第二天长沙的居民就都冒着细雨把瓦送到工地上，营房建造的步伐就加快了。

消息很快传到临安。枢密院中的反对派以为抓住了把柄，便纷纷弹劾辛弃疾聚敛民财，强拆民房，降下“御前金字牌”，下令停止建置营栅。辛弃疾接到“御前金字牌”后，毅然地把它悄悄收藏起来，不动声色地继续进行修建工程，而且下令限在一月之内完工，违者以军法从事。

修建进度一加快，石料的供应就跟不上了。怎么办？辛弃疾又下一道命令：调监牢中的犯人到长沙城北的驼嘴山开采，以开采石块的数量赎罪。这样一来，一队队囚犯开拔到驼嘴山下的麻潭，争先恐后地凿山取石，保证了修建营寨用石的供应。

“飞虎军”营寨按期完成后，辛弃疾把经费来源、经营过程和营栅图样一并上章呈送给赵昀。赵昀看了，挑不出什么眼来，反对者也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这支“飞虎军”在此后四十年内，成为长江一带边境的重要防御力量，金人对它非常害怕，称它作“虎儿军”。

带湖闲居，陈亮来访

创建“飞虎军”后，辛弃疾又被调到江西、浙江等地担任了一个时期的地方官。由于他坚持抗战，不畏权贵，经常受到大地主投降派的攻击。谏官王蔺、崔敦诗等人就弹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凭陵上司，缔结同类”。根据这些“罪状”，宋廷于一一八一年冬削夺了他一切官职。

这时，辛弃疾正在江西上饶买了若干亩田地，又派人去修建了一座房舍。新居刚一建成，他恰好落职，便搬到那里居住。

新居在上饶城北一里许，舍旁是狭长的湖泊，辛弃疾将它取名为“带湖”。湖畔的土地，高处建舍，低处辟为稻田。湖边遍插垂柳，园内栽上梅菊，湖上鸥鹭徘徊，水面点缀着青萍、绿藻，映着远山的倒影，一派苍凉辽阔的景色。辛弃疾把新居取名“稼轩”，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别号。

在带湖，辛弃疾终日过着与鸥鹭为友的闲散生活。他一再地表示要“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然而，这仅不过是聊以自嘲的牢骚话罢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尖锐的社会矛盾，使他无法甘心过“左持蟹，右持杯”的闲散生活。在斜风细雨的长夜里，他在灯下读《李广传》，心潮澎湃，“不能寐”，想起了“汉开边，功名万里”的沙场宿将，追慕着他“射虎南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豪情壮举，最后发出了“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的感慨，流露出自己闲置家居的愤懑和不平。辛弃疾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思想中自有消极的一面，摆

脱不了老庄遁世哲学的羁绊。但是，他胸中的爱国热情始终如烈焰般熊熊燃烧着。在为友人韩元吉祝寿时，他讲到西晋王衍（夷甫）等人清谈误国的历史教训，在结尾满怀豪情地写道：“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在他的笔下，经常出现着“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一类的词句。这些气势豪迈的“稼轩词”，一扫统治南宋词坛的偎红倚翠、征歌逐醉的靡靡之音，开创了一代词风。南宋后期著名的爱国词人刘克庄曾给予这样的评价：“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

在带湖闲居期间，辛弃疾怀念着自己的同道好友——陈亮。陈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早在——一六九年，他就写过《中兴五论》，主张收复失地。——一七八年，他又到京城临安，接连三次上书给赵昀，要求皇帝乘“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痛自克责，誓必复仇”。这年，辛弃疾恰好也在临安，两人见面后，意气相投，结成了莫逆之交。转眼十年过去了，辛弃疾宦游各地，陈亮也屡遭不幸，甚至受诬下狱。辛弃疾听到陈亮的遭遇，十分关切，曾特意“赋壮词以寄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他通过对青年时期抗金斗争的回忆来激励陈亮。

一一八八年，辛弃疾在与上饶接壤的铅山县东北境期思渡旁建了一座新居，新居附近有一池白形清泉，取名“瓢泉”。这年冬天，陈亮从浙江东阳来到铅山，辛弃疾扶病热情接待了阔别十年的挚友。

陈亮这时已经四十七岁了，但还象往常那样锋芒毕露，谈笑风生。他告诉辛弃疾，春天他曾离家到金陵、京口两处去察看军事地形。辛弃疾说：“这两地真是天险呀！可惜朝廷倚恃天险，偏安江左，无意恢复中原！”陈亮说：“京口连冈三面，大江横陈，其势如猛虎出穴，宜于进取，不宜退守。天意决非以大江划分南北，岂可苟安江南一隅，屈膝求和！”辛弃疾说：“自符离之败以后，‘南北有定势’的论调甚嚣尘上，和战之权完全在敌人的手中，彼利则战，彼倦则和，而我朝中文臣武将，却只见一时之挫败，不悟媚敌求和乃膏肓之大病。”陈亮说：“不错。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南渡至今，已近六十年了，向金人纳币称侄，亦业已二十三年。目下文恬武嬉，都作永久偷安之计，可羞呵可耻！”辛弃疾不胜感慨地说：“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中原父老在金人欺压之下，怨已深，痛已巨，怒已盈，遍张义帜，纷纷而起，无奈朝廷虑不及此，徒使民气索然！”

辛弃疾与陈亮，在瓢泉之旁开怀畅叙，他们共同关切着祖国的命运。过了几天，他们又到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去游览。

鹅湖并不是湖，而是一座从福建蜿蜒而来的山脉的主峰。山下的官道旁有一座寺院，叫鹅湖寺。十余年前，南宋理学家朱熹、陆九渊、陆九龄、吕祖谦等人曾经在这里聚会讲学，为了争执谁是理学正统而狗咬狗地闹了一阵子，还肉麻地被那些酸道学们捧称作“鹅湖胜会”。往事已成过去，鹅湖寺而今已变得沉寂冷落了。陈亮一进寺门，仰首笑道：“哈哈，这不是朱夫子（指朱熹）传经播道的所在吗？怎么门下连香火也没有了？”辛弃疾问：“听说这几年你们书信往返，各执己见，争得不可开交？”陈亮答：“不错。如今的儒士，论恢复则曰‘修德待时’，论时政则曰‘正心守法’，其实都是风痹麻木之辈，清谈误国之人。他

说我‘血气粗豪’，要我‘以醇儒自律’，我偏要倚天而号，提剑而舞，做个血性的男儿！”辛弃疾说：“对了，他也劝我‘早向里来有用心处’呢！”陈亮说：“腐儒！腐儒！风不动则不入，靠‘正心诚意’，岂能驱除金人？如今的儒生，就是不敢言平戎之事，真如槁木死灰矣！”辛弃疾说：“耕也馁，学也禄，孔之徒。死读经书，无非要博取高官厚禄而已！”陈亮听了，忽然提出：“何不用儒字为韵作首诗？”辛弃疾想了一下，吟道：“是是非非好读书，莫将名实自相诬。由来废冢谁为者，诗礼相传大小儒。”陈亮拍手叫道：“好！好！”

陈亮与辛弃疾盘桓了共十天，回浙江永康去了。这时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积雪掩盖了山径。辛弃疾觉得还有许多话要对陈亮说，第二天便又去追赶陈亮，想再畅叙一番。他走到一个叫鹭鸶林的地方，雪深泥滑，只得投宿在一个吴姓人家的家里。夜半邻近有人吹笛，悲切的声调划破了寂静的冬夜，引起辛弃疾思绪万千。他和朱熹关系本来很好，这次和陈亮来鹅湖，也曾事先约朱熹一起来相会，但是朱熹却并没有来。朱熹的心思不一样啊！他认为“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图乎？”对于统一中国完全丧失了信心。辛弃疾的看法却不同，他想到：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多少时间是分裂的？统一是长期的，是大势所趋。尽管现在没有驰骋疆场的机会，但他并不气馁，决心在统一祖国的战斗中大显身手。辛弃疾夜不成寐，翻身起，在灯下写了一首《贺新郎》寄给陈亮。不久，陈亮寄来两首和词。辛弃疾又用原韵赋了一首词回赠。词的后半阙是：

事无两样人心别。问渠侬：神州毕竟，几番离合？汗血盐车无人顾，千里空收骏骨。正目断、关河路绝。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

辛弃疾和陈亮相互唱和的几首词，表达了统一中国、至死不渝的共同信念。他们二人不但在政治主张上志同道合，在文艺观点上也非常一致。他们的词，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流派。从晚唐到南宋，文学上一直有“诗庄词媚”的传统见解。宋室南渡以来，统治集团过着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御用文人们写词，在形式上是讲究审声协律，雕章镂句，在内容上无非是渲染艳意别情、酣歌醉舞，以倡伎歌女持红牙拍浅斟低唱为乐。辛弃疾和陈亮则打破了这些清规戒律，以文入词，以论入词，尽情地抒发了爱国的热情，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使词得到了解放。

“男儿到死心如铁”

一一九二年到一一九四年，辛弃疾被任命为福建提关刑狱和福建安抚使。不久，又遭攻击落职。一一九六年，他的带湖住宅失火，于是举家迁居铅山，在瓢泉消磨了近八年岁月。朱熹对他千方百计进行笼络，特意赠给他八个字：“夙兴夜寐，克己复礼”。但辛弃疾对恢复儒家的一套毫无兴趣，朝夕萦怀的是抗敌大业。当十三世纪来到了人间的时候，金国在中原的统治更加腐败，北方的蒙古族已经崛起。南宋这时由韩侂胄当权，他禁道学，打击投降势力，追夺卖国贼秦桧的封爵赠谥，招兵造船，准备北伐，并起用了一些主战派人

士。辛弃疾一向是以主战最坚决闻名的。一二〇三年六月，他被任命为浙东安抚使。

这时，辛弃疾已是六十四岁的老人了。但是，他看到朝野出现了备战气氛，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他在为韩侂胄祝寿时，纵笔直抒了自己的胸臆：“堂上谋臣帷幄，边头猛将干戈。天时地利与人和，燕可伐与曰可。此日楼台鼎鼐，他时剑履山河。都人齐和大风歌，管领群臣来贺。”他认为进行北伐的条件已经齐备，并引用刘邦统一中国后返回故乡的典故，表示了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坚定信心。

辛弃疾在绍兴担任浙东安抚使期间，除察劾了一些地方官吏贪赃枉法的劣迹外，更关心的是进一步了解金国的内部情况。这时，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也在绍兴县西九里的三山住着。辛弃疾对陆游非常钦佩，经常到陆游那里去促膝交谈抗金的意见。一二〇三年年底，辛弃疾应赵扩（宁宗）的召见去临安。年已八旬的陆游看到两鬓斑白的辛弃疾风尘仆仆，为国操劳，非常感动；同时，也对他寄托着殷切的期望，于是写了一首长诗为他送行。诗中写道：“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天山挂旆（pèi 沛）或少须，先挽银河洗馘华。”他把辛弃疾比作管仲、萧何这样有雄才大略的法家人物，鼓舞他在抗敌斗争中作出新的贡献。诗的结尾写道：“古来立事戒轻发，往往谗夫出乘罅。深仇积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他激励辛弃疾以民族大业为重，团结对敌，把仇恨集中到共同敌人的身上。

一二〇四年三月，辛弃疾被派到镇江去做知府。镇江在长江边上，是北伐的前进基地。辛弃疾来到这里，深感南宋官军腐败不堪，不能担当北伐重任。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上。他首先定制了一万套军服，打算招募一万名江淮一带的农民，加以训练，而且特别强调不能与南宋禁军混杂一起，以免染上禁军腐败的恶习。他不仅对两淮一带的军事部署作了精心的规划，而且不断派人深入金国侦察敌情。

一二〇五年春，他巡视江防，来到镇江城北的京口，不禁触景生情。在这里，孙权曾建立吴国首都，打败了来自北方的曹操的军队；在这里，南朝宋武帝刘裕曾起兵北伐，气吞万里，光复洛阳、长安。他登上晋朝谢安修葺过的北固楼，看着波涛翻滚、奔腾不息的长江，想起陈亮谈起过的京口的地势，真是“如虎出穴”，是出击金人的好地方呵。现在，陈亮已经去世了，他统一中国的遗志还没有实现。辛弃疾极目北望，江面大雾弥漫，江水滚滚东去，不禁心潮汹涌，起伏如浪，于是写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móu 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但是，辛弃疾不久又受到了投降派的攻击，被撤了职。一二〇六年五月，宋廷正式发布伐金诏命，然而出师不久，便溃败下来。一二〇七年春，宋廷任命辛弃疾为兵部侍郎，但是他不久便身染重病，只得回铅山养病。秋天，金人提出以韩侂胄的头颅为议和条件，韩侂胄又要起兵北伐，遂任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命他立刻来临安报到。诏命送到铅山，辛弃疾已病危卧床不起，只能上章请辞。

九月十日，辛弃疾与世长辞，死前还连呼“杀贼”。

童工的血泪

——读苏修短篇小说《第一次领工资》有感

周 勇 闯

瓦锡卡的父亲在工地上死去，母亲一下子变得茫然失措，胆小畏缩。刚念完八年级的瓦锡卡不得不停止上学，带着忧郁的神色跟母亲来到工厂乞求工作。一位老电工问：“怎么要你这么小的人来做工了？”瓦锡卡答：“嘴虽小，可饭总是要吃的。”这是苏修短篇小说《第一次领工资》中所表现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童工。

由此，不禁使人联想到俄国作家绥拉非摩维支在短篇小说《小矿工》中对沙皇时代童工的描绘：

严冬，一双赤裸的冻僵了的小脚，在雪地上印下了一行歪歪曲曲的脚印。十二岁的辛卡，被父亲催着，骂着，含着眼泪向矿场走去。一位矿工问：“为什么强迫孩子呢？”父亲答：“不是我强迫他，生活所逼。”

这是何等相似的两幅画图啊！不过，两者也有区别：辛卡是挣扎在沙皇时代资本家的皮鞭之下，瓦锡卡则是生活在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时代背景不同，画面却是一样，这就深刻地表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统治下的苏联，正重演着沙皇时代的悲剧。曾经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做过国家和工厂主人的苏联工人阶级，现在已重新沦为牛马不如的奴隶。

瓦锡卡中断学业去做童工的遭遇是发人深思的。为什么他那个做工的父亲的死去，会逼着儿子去当童工呢？作者不敢触及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千方百计地进行粉饰。你看，瓦锡卡的母亲为了让儿子做上童工费了多大劲儿，不仅托人找门路，而且还不顾别人的嘲弄，亲自跑到厂里向车间主任苦苦哀求。难道瓦锡卡乐意当童工吗？难道瓦锡卡的母亲欢迎儿子受剥削吗？难道车间主任收下瓦锡卡做工是慈善的行为吗？不，瓦锡卡的遭遇是痛苦的。瓦锡卡的父亲，是在给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中的工地上死去的。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一个工人的死亡，就象一件使用价值被损耗殆尽的商品一样，从此就再没有关心的必要了。而对于工人的一家来说，家庭主要劳动力的丧失，意味着经济来源的断绝。在瓦锡卡的母亲看来，丈夫这个劳动力作为商品已经出卖完了，为了免于死亡，除了送瓦锡卡当童工，挣一点微薄的工资暂度饥寒，还有什么出路呢？“嘴虽小，

“可饭总是要吃的”——瓦锡卡这句话，渗透着多少痛苦，多少血泪！恩格斯在揭露产生童工的社会根源时说得好：“资产阶级先把工人的孩子置于恶劣的条件下，然后再利用这些恶劣的条件为自己谋利益！他们用来替自己辩解的，和整个工厂制度一样，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今日的苏联到处使用瓦锡卡们做童工，不就是已经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吗？

大量使用童工，本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大特征。通行商品交换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的是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资产阶级不仅把工人，而且把工人的妻子和子女统统赶进了商品市场。“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马克思：《资本论》）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童工是最廉价的。今日苏联的瓦锡卡们和厂长、车间主任这些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商品买卖关系。瓦锡卡做工是为了有饭吃，卖出自己的劳动力，换回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车间主任只不过是买进一件廉价的生产工具，让他为资产阶级创造更多的利润。一个要卖，一个能买，说明了现今的苏联存在两部分人：一种人是买者，他们占有生产资料；一种人是卖者，他们除掉自己的劳动力，便一无所有。前一种人是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工人的命运完全被他们操纵着。绥拉菲摩维支的《小矿工》中的辛卡，由于“生活所逼”进了矿场，从此便失去任何自由，差点被繁重的劳动折磨死；瓦锡卡为了“吃饭”而去当童工，第一次递到他手中的工资也和第一次刻在他手上的伤痕同时到来。可想而知，以后为了能“吃饭”，瓦锡卡的手上和身上又会增加多少伤痕！

一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为什么要大量使用童工呢？瓦锡卡的第一次领工资，就从一个侧面提供了答案。瓦锡卡为了自己和母亲的活命，好不容易当上了童工。盼啊！盼啊！总算第一次领到了三十个卢布。多么廉价的劳动力！先且不要和那些苏修厂长、经理相比，他们属于资产阶级，每月拿着比这高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卢布，并且享受着许多工人望尘莫及的特权；还是同一般的苏联工人比一下吧。据苏修官方公布，苏联法定的工人最低工资从一九六八年一月起为每月六十个卢布，而瓦锡卡领到的恰好是这所谓法定最低工资的一半。资产阶级无限制地剥削工人的残酷现实，总是辛辣地嘲弄他们制订的法律。然而造成工人受剥削的原因的，正是这法律所要维护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曾经有一个生动的譬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面，假设一个盆子盛着国民劳动的全部产品，工人的汤匙太小了，资本家获得的汤就会更多。工人领得越少，资本家占取得越多；劳动力的价格越低，资本家得到的利润越高。随着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强，资产阶级总会以各种名目掠取廉价劳动力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甚至不惜“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马克思：《资本论》）在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苏联，瓦锡卡们越多，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掠取的利润也就越多。

瓦锡卡好不容易领到这可怜的三十个卢布，尽管连最低限度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可是仍然不能如数带回家中。领工资那天，瓦锡卡把老工人安德烈·谢苗内奇叫到一边，一定要他帮忙买两瓶红葡萄酒请客。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请什么客？”老头子感动起来了。“还是把钱带给你妈妈去。”

“不，她自己对我说的，叫我请客……她说：我要不请客，就会受到欺侮的。”

这就是瓦锡卡忍痛请客的秘密。原来，用第一次领到的工资去买两瓶红葡萄酒，纯粹是为着防止周围的人们对他的“欺侮”。是谁“欺侮”新来的瓦锡卡呢？这更值得追究。在资产阶级专政的苏修社会，劳动力如同其它商品一样，都具有一般价格而彼此互相竞争着，资产阶级总是用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不断排挤价格相对高一点的劳动力，以图获取更多的利润。在童工大量出现的苏联，每年就有一千万人次的成年工人被踢出厂门。因此，尚未觉悟的工人会从瓦锡卡手中的三十个卢布，想到自己这个劳动力的价格的降低或丧失，由此而下意识地讨厌这个竞争者。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攫取高额利润，总要千方百计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一手扶起一些工人贵族，一手把广大的工人打到最底层。这样一来，资本家丑恶的嘴脸掩藏起来了，而使工人为了眼前的和个人的利益彼此竞争不休。恩格斯说过：“这种竞争对于工人来说是现代各种关系中最坏的一面；这是资产阶级对付无产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事实上，在工人阶级内部，从来就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始终是些资本家阶级。当工人还没有高度觉悟，看不透资产阶级的阴谋而处于分裂状态的时候，就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就必须依靠本阶级的坚强团结，自觉地从事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正如马克思说的：“应当摒弃‘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这种保守的格言，而要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工资价格和利润》）我们相信，苏联的工人一旦看清了苏修叛徒集团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面目，就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革命的口号。那时，苏联大地上又将响彻恩格斯所赞赏过的战斗诗句：

“快打倒国王，刽子手国王！”

千百万工人，起来，前进！

我们把他的手紧紧捆绑，

趁他还没吞灭全国人民。

“你们的愤怒就快要觉醒，

你们就要张口高声呼喊。

那伙镀金的寄生虫一定

会和暴君一起跌入深渊”。

附： 第一次领工资

作者 尤里·阿达莫夫

(载苏修《青春》杂志 1974 年第 10 期)

瓦锡卡是个大耳朵的小伙子，是他的母亲把他领到电气车间来的。他母亲是个皮肤白晰的年轻妇女，穿着灰色羊羔皮领的蓝斜纹呢大衣，围着深色的绒毛头巾。她在等车间主任时，工人们都好意地打量着她，只有离开班组独自在工作的车工杰米特里没有转过身来，而在自己的车床边摆弄着什么。

瓦锡卡手里拿着帽子站在离她二、三步远的地方，仰着头在看第四季度车间所承担的一大批社会主义义务的单子。看罢后，他陷入了沉思，好象是在用这些义务衡量自己，并思考着是否完成得了。

车间主任终于从办公室里出来了。他那圆圆的男孩子般的脸上容光焕发。他向瓦锡卡的母亲走去，于是她又微笑了一下，指着瓦锡卡开始对他说些什么。

“我们到办公室去说吧，”他作了一个手势，好象想抓住她的胳膊肘。

“哼，带进去啦……”一个细长个子的小伙子把烟卷从嘴巴的一边转到另一边说。

“又怎么啦？”组长为车间主任辩护。接着他又低声地补充道：“住嘴，小孩子会听见的，这不好。”他走到孩子面前，蹲了下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瓦锡卡。”

“你来干什么的？是来工作还是怎么的？”

“来工作的，可母亲怕人家不收。”

“这就会收你的。”车工杰米特里并没对着谁，在车床旁咕噜着。“会说服的嘛……”

几分钟以后，瓦锡卡的母亲和车间主任从办公室里走出来了。主任朝男孩子走来，并且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说：

“好吧，你就在我们这里工作吧！……想学车工吗？”他朝杰米特里那边摆了摆手。

瓦锡卡先用淡蓝色的大眼睛看了看主任。然后看看心满意足的母亲，接着冷淡地说：

“行。”

“你就跟他学，”主任重复了一遍，“他是高明的车工，他会教会你的。明白了吗？”

“怎么会不明白呢？”

接着，主任再次对着瓦锡卡的母亲说：

“孩子我们收下了。给人事处的便条我已经给你。让小伙子在这儿熟悉熟悉，您就到那里去走一下。我已经通知他们了。”说着他轻轻地握了握女人那伸出来的手。“再见！”

车间主任想起，前天一个熟人是怎么打电话来请他收下孩子当学徒的。“孩子已经念完八年制学校，”朋友说，“你别看他小，他可是活泼伶俐的，收下他吧，”“让他进职业技术学校好啦，”当时主任无精打采地反驳道，“我这里不是幼儿园。”朋友久久地向他解释迫使母亲把儿子送到工厂来的原因。主任并没有去注意听他：实际上，他是能够接收孩子进车间里当学徒的。他表示不同意多半只是为了摆摆样子，为了不至于显得因为听到朋友开玩笑提起这孩子的母亲是个漂亮的年轻寡妇，所以他就收下了。讲到最后，他终于表示同意，而且使他自己感到奇怪的是他竟连续两天都在等待这个陌生女人的来临。

“嗯，我该走了。”母亲对瓦锡卡说着又抚摸了一下他的头。

“你走吧。”他点点头，于是不等她走出车间，他就向存衣室走去了。

瓦锡卡的父亲是在工地上死去的……这个意外的死讯传来以后，母亲不知怎么地一下子变了，变得茫然失措、胆小畏缩，连孩子也认为她甚至连走路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绊倒或摔跤。

在存衣室里，瓦锡卡把大衣和帽子挂到挂钩上，然后就开始在放靴子的大箱子里翻来翻去，从中寻找尺寸较小一些的靴子。他拖出了一双认为还能穿的破旧靴子，坐到凳子上，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的白色包脚布就把它灵巧地缠到自己细小的脚掌上。接着，他把脚伸进了靴子，并若有所思地在存衣室里走了一圈，检验一下，包脚布磨不磨脚。他知道，包脚布缠得不好会把脚磨出血来的。他摇了摇头脱下上衣，为了不致弄脏，他把它翻个里朝外挂到了大衣旁边。

组长看到他那不慌不忙的、顺当的动作，显然这不是一时的努力，而是长期养成的习惯，不禁暗自低声说道：“俭朴的小伙子，”接着不知为什么又叹了一口气。

瓦锡卡又给自己找了件背上被白油漆弄脏了的连衫工作裤，伸手把它拎起仔细地看了看，检查一下口袋上是否有窟窿，然后穿上靴子，在腰上束了一小段电线就到车间去了。

他向杰米特里那边走去，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地点现在就在车工的近旁。而那车工停下了车床，用纱头擦干了沾满油污的阔手掌，从上向下地瞧着这个镇静的孩子。

“看什么，小家伙！”他厉声说道。“你还不到摇手柄这么高呢！去……你的工作就是用纱头擦车床。”他挥挥手示意道，瓦锡卡作为学徒，责任就只是这些。

午饭时，工人们在存衣室里围住了瓦锡卡。

“怎么要你这么小的人来做工了？”老电工安德烈·谢苗内奇象看什么奇怪的东西那样看着这男孩子。

“嘴虽小，可饭总是要吃的，”瓦锡卡打开包午餐的报纸严肃地回答。

“不错，”安德烈·谢苗内奇赞同地说，并从头上摘下了沾满油迹的帽子，摸了摸秃顶重复地说道：“是这样的……”

工人们默默地围成了一圈坐着，他们看着这男孩，模糊地感到有些对他不起似的，因为他这么小这么弱就同他们大人一起干活了。

“唉，是个勤快的人呢！……”组长叹了口气说，并用自己粗糙的手掌抚摸了一下瓦锡卡的脑袋。“一头多么淡的毛发……”

瓦锡卡在班组里待熟了。由于杰米特里没把车床信托给他，因此他暂时还没有学做车工。但这小伙子在车间里干了很多需要干的事：帮助大家干些零活、整理工作台、扫地、收拾工具。

他已经参加过工会和共青团的会议，但每次都坐在较远的角落里，躲在人家背后，好象害怕有谁会看见他，并问他：“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初看上去，他什么也没做，但他的工作却是很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并不表现为有什么实际的成效，因为他并不生产什么东西，而是表现为一种微妙的、象空气那样看不见的东西，没有它就象没有空气一样不行。看到他经常在车间里跑来跑去奔忙的身影，工人们心软了，他们的脸上呈现出一致的笑容。

到快下班时，工人们疲乏了，有时也会对瓦锡卡叱责几声。瓦锡卡并不生气，他感觉到他们的叫喊不过是由于劳累而并不是恶意的。

瓦锡卡看到，工人们在有些方面也象大孩子似的，于是不知不觉习惯地对他们使用起那种对母亲说话时一样的埋怨口气。

“……搞得象个猪圈，这些鬼！”他用毛刷子打扫着工作台，嘟哝着说。“那谁去收拾？瓦锡卡？”要不，他一边收拾着扔在各处的工具，一边低声喃喃地抱怨道：“看，就这么乱扔！他们大概知道，瓦锡卡会收拾的！”

有时，某个工人会坐到他旁边，把沉甸甸的手放到他瘦弱尖削的肩上，请他吃糖。在这种时刻瓦锡卡又暂时成了小孩，羞怯地笑着，撕开糖纸把糖囫圇塞进嘴里。但几乎马上又象想起了什么事似的说：

“是你在铁砧旁边刨了吗？看吧，主任瞧见又该发作了！”

“好，瓦锡卡，不要抱怨了，我这就去收拾。”

“我已经收拾了，”小孩子生气地说。“不用怕。”

“看你这么认真，象谁？”有一回安德烈·谢苗内奇问他。“你还是个小孩呢，你还在玩的年龄呢……。”

“我象父亲！”瓦锡卡解释说。

“那你的父亲是谁呢？”

“我没有父亲，”孩子说，“我和母亲一起生活。”

“那他，你的父亲究竟在哪里呢？”

“父亲死了，是在事故中死去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头子伤心起来了。“嗯，有什么办法呢，就是有这样的事。对啊……不过你的眼睛好象有些象母亲？”

“不，我母亲是快乐的。”瓦锡卡慢慢地说。

拿工资那天，瓦锡卡把安德烈·谢苗内奇叫到一边，象要搞什么密谋似地向四周环顾了一下说：

“谢苗内奇，跟我一起到商店去一次好吗？我想买瓶红葡萄酒，就怕他们不卖给我……要请请大伙，我们本组的人——拿工资了嘛。”

“你请什么客？”老头子感动起来了。“还是把钱带给你妈妈去。”

“不，她自己对我说的，叫我请客……她说：我要不请客，就会受到欺侮的。”

“欺侮……你妈妈太蠢了，”电工不愉快地说。“有谁会欺侮你？……不要把钱花在酒上！孩子，不要这样……”

“她不蠢，她是为我担心。”瓦锡卡喘了口气说。

“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到处都是人……我们喜欢你。”老头子考虑了一下，吧哒着嘴巴说：“要说杰米特里，别去管他，他不是凶恶。他是严厉。生成这样的性格……”

杰米特里或许确实不凶恶，但瓦锡卡在他那里已经够受的了。除了帮助他本人以外，他不愿意让孩子帮助别人，因此总是找事给孩子干：擦拭车刀、收拾刨屑、擦洗车床，或是其他什么事情。然而，当瓦锡卡坐在他背后，并观察着他是怎么工作的时候，他就好象很满意，在这种时候如果瓦锡卡被谁引开去了，那他就会发火。连他自己也没法确定，他对瓦锡卡是什么样的感情。

饭后拿了工资，工人们在车间里荡来荡去，抽抽烟，干着各种琐碎小事，装个干活的样子。已经没有心思认真工作了。至于计划，他们宁愿到以后的日子里靠更紧张的劳动去赶完。大家都在等待着时间一到可以聚集到存衣室去，在那里磨蹭到铃响。瓦锡卡同样也在闲荡。

为瓦锡卡的母亲而指责过车间主任的那个最高的小伙子冷不防地叫了起来：

“瓦锡卡，领到钱了，而工作——要叔叔做了！……谁去收拾工作台呢？”

因为无聊，他是随便嚷嚷的，瓦锡卡也是这么领会的。他一点儿也不见怪，相反，高兴地挥挥手向工作台走去了。但这时候杰米特里离开车床向那小伙子走去了。

“嗨，你这长木头！他是你的什么人？”车工凶恶地叫了起来，显然他已完全克制不住自己，也听不到自己说了些什么。他气歪了嘴唇，象铁锤般的拳头似乎自动地就握紧了。“他是谁的徒弟？——我的还是你的？”

“你怎么，怎么啦？”小伙子惊慌地嘟囔起来，轻轻地发了几句牢骚：“瞧这个疯子！完全疯了！……”

瓦锡卡很快走过去，对杰米特里说，没什么，他会收拾的。但杰米特里也不朝他看一眼就把他推开了。孩子后退了几步就摔倒了，肩膀撞在墙角上了。工人们愤慨地喧嚷起来，但瓦锡卡却并不埋怨车工，爬起来揉揉碰伤的肩膀，微微地笑着摇了摇头。他朝四周环顾了一下，仍然把工作台收拾好了。人们用手抚摸他，温和地对他说话，而他只是默默地想着什么，微笑着。

瓦锡卡还是说服了安德烈·谢苗内奇陪他去买酒庆贺第一次领工资。在店里，他悄悄地拉着谢苗

内奇的袖子低声问：

“谢苗内奇，两瓶够吗？也许，买三瓶吧？”

“够了！够了！我们又不想大喝，不过是照习惯喝上一点……而且还在工作的地方，不好的。”

“谢苗内奇，要请主任来吗？”

“他可能已经回家了……前不久，他生了个儿子。”

外面天已经黑了。灯光从工厂的窗子里射出来。安德烈·谢苗内奇在寒风中瑟缩着，拉起了大衣领子。瓦锡卡也同样拉起了领子。

他们满身是雪，冻得满脸通红地回到车间。

瓦锡卡又一次想起今天第一次领了工资，他感到踏实而高兴。他不时地摸摸胸前的口袋，那里装着他第一次挣来的三十个卢布。崭新的纸币在回答他，轻轻地咯吱咯吱响着，好象在说：我们在这里。

他想象回到家，怎样把工资交给母亲，然后象父亲那样伸手伸脚在桌旁坐下，于是母亲就忙碌起来，围着他转，侍候他吃饭。他要挣很多钱，并且都交给母亲。到那时他们再也不需要别人，仍然是两个人一起生活。

车间里空荡荡的，寂静无声。只有杰米特里象平时一样站在车床旁边。瓦锡卡向车工走去，眼睛盯着他的大腿说：

“米佳，我们到存衣室去，好吗？”

杰米特里用怀疑的目光向车间扫了一眼。车间里是空空的。

“我不去，”他干巴巴地说。“干吗要去……我不在，你们一样会很快乐。”

瓦锡卡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一方面，他感到车工是对的，就算没有他，存衣室里一样会很快乐；另一方面，他明白，杰米特里这样做是故意为难自己和工人们。“说什么呢？”他想，“如果说，会不快乐，那是说谎……”

“嗯，反正咱们一起去吧。”他想不出其他的话。

“说过了，不去，”接着车工就大步走出了车间。

瓦锡卡目送着他，叹口气，摇了摇圆头的长着浅色头发的脑袋，就到存衣室去了。这时，他突然想到，自己成了车工与小组间形成不正常关系的原因。

他胆怯地走进存衣室。在那里，他又一次经历了又惊又喜的感觉。存衣室里，昏暗、狭窄，挂满了棉背心，中间放着一只用干净报纸盖着的鞋箱。报纸上放着他所熟悉的瓶酒，一张张小纸上还整整齐齐地放着干酪、灌肠和面包。

工人们围着箱子坐在那里低声地交谈着。看来，瓦锡卡以及他第一次领工资只不过成了一个借口，使他们能够聚在一起，安安静静地讨论一些利害攸关的迫切问题。他们仿佛已把瓦锡卡遗忘了，瓦锡卡进来时只有安德烈·谢苗内奇中断了与组长的交谈，匆忙地向他打了个招呼。

“坐吧，”说着指了指自己旁边的空位子。

“下酒菜是他们自己凑钱买的，”瓦锡卡想着。

闲谈静下来了。组长把瓶里的酒分别斟到各人的杯子里，同样也给瓦锡卡倒了，不过是小心地只给他在杯底上来了一点。

“喂，伙计们，我们来喝吧，”他说罢，看着瓦锡卡，并摸了摸他的头。

大家沉默着，毫无笑意地看着瓦锡卡。

“瓦锡卡，你，吃些东西吧，”安德烈·谢苗内奇教导他说。瓦锡卡感到他的声音遥远而微弱。“拿些灌肠去，”他又说了一遍，同时把手放到瓦锡卡的肩上。

瓦锡卡觉得这只沉重粗糙的手是如此结实而可以信赖，他放心地用脸颊轻轻地靠近它，冷不防地抽泣了起来。

“哎，我亲爱的！”老头子深受感动地说，“这小青年太激动了。”

人们突然间看到，一个应该在学校读书并且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玩的孩子竟同他们成年的男子待在一起；他们看到这里有过错，看到这个孩子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却又不是任何那个人的罪过。

瓦锡卡默默地坐着紧咬嘴唇。他那双睁得圆圆的大眼睛失去了光泽，目光变得呆板凝滞，好像是盯着自己内心深处似的。人们打扰他，向他提问题，但他不动也不响；就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

“是啊，瓦锡卡，你现在已完全是一个真正的主人。”安德烈·谢苗内奇说。

“对，瓦锡卡，你现在……这样！”组长附和着说，因为找不出更多的话，他晃了晃握紧的拳头。

组长拿第二瓶酒给大家斟上了，因此瓦锡卡紧紧地把手握在手中。他的手不象其他人那样乌黑与宽大而且长满结节，但就在这手上他也高兴地发觉了工作中擦伤和割破的创痕。

大拇指的指心上有一条细细的粉红色的刀疤，这是他用螺丝刀割破的。

瓦锡卡坐着，看着伤疤想道，如今他有一双真正的工人的手了，忍受一些痛是值得的。

“瓦锡卡！”车间里传来了车工气呼呼的叫喊声，“过来，狗崽子！”

孩子哆嗦了一下，慌忙放下杯子。接着用忧郁的眼睛向大家环视了一下，好像是请工人们原谅自己师傅的粗鲁，接着恭顺地低下长着一对招风耳的大脑袋走出了存衣室。

工人们一起嘀咕谈论起来，责怪着杰米特里。

正在那时，瓦锡卡回来了。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小伙子白里透红的脸颊几乎变成了黑色。好象存衣室里来了个头发淡淡的、蔚蓝色眼睛显得很忧郁的小黑人。

“瓦锡卡，你怎么弄得这样脏？”大家问他，但一下子又突然停止了，静了下来：瓦锡卡泪水盈眶，委屈地噙起了丰满的下嘴唇——看得出来，他快要哭出来了。

“是杰米特里用纱头搞的，”他用袖子擦着泪水解释说：“我和你们一起在这里吃喝起来，可车床却没有道理……事情就这样……”他摇摇头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哭呢？！”安德烈·谢苗内奇用无可奈何的声调问。

“唉，瓦锡卡世故地说道，“哭也罢，不哭也罢……反正杰米特里——他不是恶意……”

“好吧！”组长下决心地说，“我们不让你受委屈！”他用拳头朝箱子敲去，以致上面的玻璃杯都跳了起来。“为这样的事，杰米特里得从光荣榜上滚到魔鬼娘那儿去！你工作得很好——那对……不过，老弟，你还得象个人！……不准欺侮弱者……”

“可他不是欺侮人，”瓦锡卡坚信地说，并且好象对成年人未注意到这样明显的事情而感到惊奇似地耸了耸肩。“他没什么……”

“怎么还没什么？！”安德烈·谢苗内奇发起急来，“他到处捉弄你，还说没什么？！你看，他用纱头把你抹得这么脏！”

瓦锡卡皱起眉头，显然他是在心中考虑这样一个相当难的问题：如何把自己看得很清楚的一点向所有这些人解释清楚。这些人说着同他一样的语言，用同他一样的眼睛看事物，但他们看不到也不明白，周围发生着什么，或许他们简直不愿意看到！

过了不多久，工人都走了，只剩下瓦锡卡一个人。他不慌不忙地换好衣服，把钱塞到大衣里面的口袋里，就朝街上走去。

他对周围一切毫不在意地走着。他口袋里第一次放着那么多的钱，而且是他自己挣来的。

车站上，一群人朝驶近的车厢蜂拥挤去。

瓦锡卡试图挤上去，但是被一个胖胖的大婶用日常提的拎包把他推开了，而她却挤进车厢去了。

“走回去，”瓦锡卡决定。“干吗要夹在里面挤呢？”于是他踩着刚覆盖上一层干雪的稀烂的路面，咔嚓咔嚓地迈着矫健的步伐走起来了。

他想，领了工资给母亲随便买样什么礼物倒也不错，接着寻思起来，该买些什么。他有这样的感觉，不管他买了什么东西，肯定马上又会不中意的。倒不是因为这东西不好或者不需要，而只是因为这些东西能够买别的更好、更需要的东西。而钱总是用了就完的。“不，”他叹了口气决定，“全部交给母亲。让她想要什么就去买什么。要不你去买了，她会骂的。难道你能捉摸透她们妇女吗？……”

雪开始下得密了，鹅毛般的雪片在稀稀疏疏几盏路灯散发出的微弱昏暗的光芒中飘舞着，落下来，铺盖在地上。

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会在酒店的明亮的橱窗前停下了。

“小伙子，香烟有吗？”他听到后面传来的哑嗓门。

尽管瓦锡卡知道自己并没有香烟，但还是拍了拍几只口袋，用低沉的声音说：

“没有啦，”意思是说，刚才有的，但现在抽完了。

他转过身来，只见后面站着三个没戴帽子、肩上披着夹大衣的小伙子。他们用手搓着耳朵，把脖子缩在大衣领子里。很显然，他们是从家里跑出一会儿来买酒的。

瓦锡卡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在严寒中徘徊，而不走进商店里去。接着他一眼瞥见小伙子们在他背后使眼色，并朝他逼近。瓦锡卡想要把手伸到左边大衣里面的口袋里，但几乎同时又急忙把手缩了回来，他自己也不懂得这是为什么。某种不好的预感使他瑟缩起来。小伙子们默默地站着。接着，其中一个鼻子高高的脸上生着粉刺的青年俯向瓦锡卡冲出一股浓烈的酒味说：

“你老盯着酒看什么呢？你婆喝酒还早着呢！还是好好请请我们的客吧。”

“你们难道没有钱吗？”瓦锡卡粗鲁地问。“你们不是也领了工资吗？”

“我们吗？”另一个人在后面狞笑了一下。“是领了，可已全部花光了，而你还有。”

“你们是工人吗？”瓦锡卡满怀希望地问。

“我们？”小伙子同样奇怪地冷笑着重问了一遍。“我们是工人……”

接着，大家又不响了。瓦锡卡沉默地把微微驼起的孤独无助的背脊对着小伙子们，用眼睛盯住橱窗看。他的背脊仿佛看到了发生的一切：小伙子们踌躇不前象在等待什么似的。他看到，他们交换着眼色，象是准备要做什么可怕的事情。

突然，他感觉到后面那些人闪开了。他没有转过身去，因此也看不到他们，但背后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仿佛告诉他，虽然他们没有完全走掉，但却已经后退并且已经不再威胁着他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他已感到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瓦锡卡！”冷不防地传来了他所熟悉的哑嗓门。“你在这里干什么？”

瓦锡卡回过头来。面前站着的是车工杰米特里。他的眼睛被露出帽沿的黑额发遮着，眼睛里闪现着的不知是凶恶还是愉快的目光。

小伙子们在黑暗中消逝了，就象根本不曾有过似的。

“他们为什么向你要钱？”车工问。

“我也不知道。他们问有没有烟……后来又一个说，要我请客吃酒……我不知道……”

他突然感到，真的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小伙子们走过来，要香烟。这算得了什么呢？

车工和瓦锡卡在漆黑的街道上很快地走着。后来，杰米特里放慢了步子，说：

“你那些酒肉朋友哪里去了呢？啊？象蟑螂一样钻到缝隙里去了吧？对，对，象是些蟑螂……没什么，你明天再跟他们在一起吧，再加把劲吧！只是注意！”他生气地看着。“你要再喝酒，那就别想碰车床啦！……懂吗？我不允许。”

“不，我再也不喝了……你等一等……”他拉住车工的袖子，“我住在这里……”

“你住在这里好了，”车工咕嘟着说。看来，他并未明白瓦锡卡这话的意思。接着，他站住了，开始吸起烟来。他猛力吸了几口，说：“好啦，快回家去吧！站着干什么？行了，我们又不是要一个月不见面。明天就看见啦……明天我又要扒你的皮啦。”

车工最后一次深深地吸了口烟，接着，瓦锡卡看到他的烟在黑暗中画了个漂荡的圆弧形就掉在雪里熄灭了。随后黑黑的身影也消失在昏雾中。“我今天可领到工资啦，”瓦锡卡看着肮脏的玻璃上自己呼的一团气，又想到了这个。

(朝晖译 未呈校，本刊作了删节)

怎样更好地支持 知识青年扎根农村？

——部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座谈会纪要

编者按：今年，本市各高等院校举办了首批“社来社去”的“函授辅导教师培训班”。许多知识青年，怀着扎根农村干革命的红心，来沪学习。乘这个机会，本刊编辑部邀请部分学员座谈他们几年来在农村三大革命第一线战斗的体会。他们以坚持乡村的实际行动，有力地批判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污蔑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谬论，同时也告诉我们每个部门、各条战线的同志，为了巩固上山下乡成果，支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干革命，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徐招林(江西贵溪县渔塘公社农科所)：

怎样才能坚持乡村干革命？几年来我的体会就是要斗。要同党内走资派斗，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斗，同旧的习惯势力斗。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嘛！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党内走资派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必然攻击上山下乡，反对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前个时期，邓小平刮起

右倾翻案风，叫嚷什么“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工农的邪路，变成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我们一定要与走资派对着干，哪怕刮起十二级台风，始终坚持乡村不动摇！

戎惠伟(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

我是一九六八年冬到革命老根据地井冈山插队落户的。一九七三年，被调到县农田水利局工作。我人在局里，心想小通，多次申请回队。有的领导感到不可理解，要我慎重考虑；有的人还埋怨我，“在局里工作是工作需要，也是合情合理的，难道小通缺了你就行？”但我想：农村是我们的

主要战场。对资产阶级法权、三大差别抱什么态度？限制它还是扩大它？这是衡量我们革命、不革命或反对革命的标准。我坚信，不拿工资拿工分，不当干部当农民，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实际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最后，得到领导同意，我回到了生产队。对于我们坚持乡村的革命行动，有人却讲：“你们是傻瓜。”我们说：“只要对革命有利，我们心甘情愿做这样的‘傻瓜’。”也有人讲：“靠你们几个人，改变得了农村落后面貌？”我们说：“走这条道路的，决不是几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几代人。”也有人说：“你们太苦了！”我们说：“干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老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新一代就要战逆风，顶恶浪，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直奔共产主义！”

支持我们扎根农村才是真正的关心

高云芳（黑龙江爱辉县四嘉子公社小三家子大队）：

上山下乡的斗争这样尖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对我们最根本的关心？毛主席教导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觉得，生活上的照顾当然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思想上的教育培养，支持我们在农村大有作为。

我们党支部十分重视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和培养。他们说：“咱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全党动手，培养新人，让毛主席省心，革命家长放心，知识青年安心。”因此，支部不满足于知识青年“睡有床，住有房，吃有粮”，而是精心培育，让广大知识青年能够大有作为。支部经常对我们进行扎根

魏炳发（安徽灵璧县梅圩公社青年农场）：

要巩固上山下乡的成果，一定要深入批邓，造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今天在社会上还有不少对于上山下乡的错误看法。每逢我们春节回上海探亲，经常遇到一些亲戚朋友，问我们有没有调上来，听说七、八年还在农村，总是好象十分遗憾的样子，安慰我们：“好好干吧！”似乎我们在农村表现不好，或者犯了什么错误。有些家长也总觉得自己孩子在农村和泥巴打交道，脸上无光彩，比人矮一截，想方设法要把子女调上来。逢到这种情况，我就向他们宣传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揭露邓小平破坏上山下乡的罪恶用心，介绍我们在农村的战斗生活，取得了一定成效。总之，要造成这样一种舆论：光荣，属于我们坚持乡村斗争的青年们！

教育，为我们举办“理想和前途”、“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学习班，鼓励我们与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决裂。在党的教育下，我们大队出现了一批铁心务农的“扎根派”。党支部还把青年人推到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去摔打。在公社和大队的卫生所、广播室、电灌站、科研组、苗圃、养猪场、奶牛场、学校等各个岗位，都有我们知识青年在战斗。有的青年当了广播员，三年里写稿三百多篇，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好人好事，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有的知识青年，搞出了七铧犁引墒播种自动调剂等五个项目的技术革新，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有的知识青年，参加了大队科研组，对大队每块土地作了土壤分析，为改良土壤作出努力。我们深感“广阔天地，大有作

为”，越干心里越亮堂。
钱铁牛（安徽霍县五七公社五七农场）：

小高的问题提得好。如果离开了“扎根”还是“拔根”这一斗争来谈什么“关心”，这样的“关心”是值得研究的。邓小平不也是打着“关心”知识青年的幌子吗？他极力宣扬“读书做官”、“小人务农”等孔孟之道的破烂货；要把我们从贫下中农中间“拔”出来，实际上包藏着阴险的祸心！

刘必武（吉林珲春县春化公社苇帽顶子大队分水岭生产队）：

我感到，知识青年到了农村要发扬青年人那股敢想、敢说、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同贫下中农一起，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党组织的支持是最要紧的。对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是热情支持、积极引导，还是漠然处之，“摆平”算数，甚至看不顺眼，横加指责，这是对待知识青年的根本态度问题。

分水岭地处祖国北疆，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解放后曾多次试种水稻，都没有成功。刚到生产队，我们就和贫下中农一起再一次提出了试种水稻的建议。有些人表示反对：“几个上海娃，哪能种出水稻来！”但我们的想法得到党支部的有力支持。我们广泛宣传大寨人在虎头山上种水稻、创高产的先进事迹，宣传种水稻的意义，终于统一了认识。第一年试种三十亩，现在已扩大到三百亩，亩产达七百多斤。我们还和贫下中农一起改革耕作制度，玉米等作物亩产也有显著提高。

徐招林：

知识青年在党的培养 and 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有扎根农村、改变农村面貌的愿望，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我认为，除了政治

思想上关心，从组织上加强培养使用也是很重要的。我本来插队在农村，后来，领导上调我到公社农科所担任农技员。因工作的需要，天天接触农业生产中各种问题，促使我认真学习。现在我们所里十三个人，有八个是知识青年。我们积极开展科学种田，改良土壤，合理密植，培育良种。我们培育了早稻和晚稻良种各二十多种，向各大队提供良种万余斤，改变了种子退化的趋势。我们所里种的二十七亩水稻田，从原来二、三百斤的产量提高到平均亩产一千零八十八斤。现在，我们真正感到农村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业。

杨星卫（江西井冈山拿山公社小通大队）：

要大有作为。对我们知识青年说来还有一个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的问题。来农村后，我们感到气象预报对农业关系很大，决心为革命识天气，为增产办气象。党支部、贫下中农大力支持我们，派我们到气象站学习。为了把预报工作做好，我们除了坚持收听广播，坚持观测外，还主动到贫下中农家访问收集农谚。贫下中农也积极把丰富的看天经验传授给我们。做饭的妇女看到米汤上有皱裂，就来告诉我们今天晴；抽烟的老人摸摸烟丝潮湿，也来说会下雨；连放牛的小孩看到鸟在山脚下阴，马鞭草发白，也会跑来“提供情报”。刚办时，没有经验，也常有报错的，个别人就说什么“黄毛丫头能管天，还不是轮船上架橹——做样子”。但贫下中农却说：“干什么事哪能刚学就会呢？”有贫下中农真心实意的支持，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通过学习、实践，我们初步掌握了测报的本领，预报准确率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组织起来就是好!

周秀俐 (江西新干县鸡丰公社东岭背青年队):

我们东岭背青年队是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才成立的,共有二十一个知识青年。全队共有一百十四亩农田,全年总产量达五万余斤,除去每人人口粮,向国家提供商品粮近二万斤。我们还自建了仓库、住房、猪场,办起了木制品加工小作坊。每人扣去口粮费,平均收入一百三十余元。

原来我们是分散插队的。经过几年锻炼,劳动和生活都不成问题,不少男青年农活样样拿得起。但是由于分布过于分散,一人一队,一人一灶,除了出工外,还要砍柴、烧饭、喂猪、种菜,什么学习革命理论,大搞科学种田,全部挤光了。因此,我们决定办青年队,充分发挥组织起来的优越性。

要办青年队的消息一传开,青年们可积极了。知识青年小李,为了酝酿办青年队,虽然两年没回上海,结果在上海呆耽了十天,而九天又是用来挨家挨户访问座谈,进行串连。小徐的父母起先说:你如今又是队长,又入了党,今后上调总有你份,如果进了青年队,就走不了啦!小徐说服了父母,坚决参加了青年队。办青年队还得到了革命家长和工人师傅的支持。小刘的母亲是上海某厂的工人。厂里工人利用废旧零件,只花了二百五十元,帮助装配了一部刨板机和一台圆锯。

在青年队,我们一天紧张劳动以后,一起学习革命理论,开展革命大批判,学唱革命歌曲,开展文娱活动。每个人还分别参加理论组、农机组、科学种田组,形成了一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钱铁牛:

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尖锐复杂,我们青年人组织起来后,人多势众力量大,心明眼亮意志坚。由于农村缺少技术力量,一些垄断技术的黑机手借修机为名,行诈骗之实,我们十分气愤。一九七四年,我们公社的八名《农用柴油机》函授学员参加了上海交大在县里举办的二十天农用柴油机短训班,组织了一个“五·七”柴油机修配小组,背起工具包,走村穿庄,与黑机手对着干。我们不吸群众一支烟,不喝社队一盅酒,不吃社员一顿饭,几个月,修理了四十三台柴油机,检修了几十部柴油机,还深入每个生产队,为三百多台柴油机建立了“保养档案”。在公社党委支持下,我们又分批举办农机短训班,为全公社十四个大队培训了三百六十多名农机手,建立了农机修配网。去年下半年,在上海纺织工业局、同济大学和县农机局支持下,我们又配备了一批修配设备,基本上做到上有修配厂,下有修配组,大修不出公社,中修不出大队。贫下中农说:“黑机手想走的资本主义道路给堵死了!”现在,五·七修配组已经发展成为亦农亦工的五·七农场。张俊伟 (江西万年县太源公社红来五·七大学):

青年队以青年为主体,科学种田、先进技术容易接受,容易推广。还可以同周围的生产队相互交流。我们红来青年队是一九七二年冬,由十七名知识青年和四户贫下中农组成的。刚建队时,只有六十几亩山高水冷,土地贫瘠的晚田垅,亩产只有一百五十斤。我们和贫下中农一起,对晚田

垅的沟沟坞坞进行调查，找出了几十个冷泉眼，经过一星期苦战，开挖了一条一米宽、一米深、六百多米长的防洪渠和排泉沟，当年亩产八百六十斤，跨了纲要。第二年，我们又提出了“大干一冬春，猛攻肥料关”，和贫下中农一起卷起铺盖上山割草积肥，割草十多万斤，造了六万多斤土灰肥，终于夺得了亩产一千零五十斤的好收成。

为了坚持乡村，我们更需要学习

秦濛濛(安徽宿县南平公社青王大队)：
我从一九七〇年来淮北农村后，看到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我想：自己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应当努力掌握一点医学卫生知识为贫下中农服务。我就买了有关书籍，挤时间自学，为生产队贫下中农治疗伤风感冒一类小毛病。去年五月，上海第二医学院到我县办《医防》函授教育，贫下中农推荐我去学习。去年八月，大队党支部安排我当了赤脚医生。以前我们大队疾病的发病率比较高，影响了抓革命、促生产。去年秋季，我们把草药定期送到贫下中农手里，进行预防，基本上制止了疾病的发生。此外，农村中的流行性脑膜炎、麻疹等传染病也都得到了有效的防治。我深深感到，函授教育好。

张萍(安徽太和县许寨公社大庙大队)：

我是一名已婚的知识青年。前年，我同当地一位青年结婚后，一度由于忙于家务，对各项政治活动关心少了。在党组织教育下，我认识到自己虽然在农村安了家，但这不是扎根农村的目的，目的是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贡献。去年，我参加了上海第二医学院到我县来举办的《医防》函授学习，回到队里担任了保健员。这次，

最近，全公社六个青年队已集集成红来五、七大学。

冯金苹(江西婺源思口公社龙腾青年队)：

从我们这里的实际情况看，建立这种青年队的形式是好的。但是，生产要发展，青年要成长，将来还会有下一代，所以领导上在建队时不光要有眼前规划，而且要有长远考虑，才能使青年队不断巩固发展。

招收社来社去师资培训班学员，听说已婚青年也可报名参加，我真是喜出望外。我被录取后，生产队里的贫下中农都跑来祝贺，鼓励我好好学习，回去以后，为贫下中农背好医药箱。

李然芳(吉林怀德县双龙公社双龙泉大队)：

举办函授教育社来社去培训班，我们知识青年打心里拥护！我们要扎根农村，又迫切需要学习，但往往一上大学，就脱离了农村。不少同学为了扎根农村，就放弃上学机会。函授教育社来社去培训班，正是我们理想的办学形式。我们希望文教战线的同志们把教育革命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进一步向“朝农”学习，能招收更多的社来社去的学员。学制也可缩短，不一定一学就三年，可以学习半年，回去干一阵子，有必要再来学习，实行“几上几下”。特别在招收学员的条件掌握上，只要是扎根农村的，年龄也可适当放宽些，已婚青年更要关心。人家朝农“女王大学”不是也照样上学，照样作贡献吗？

(本文由复旦大学新闻系“社来社去”班学员协助整理)



一 九 七 六 年

第 七 期

总 第 三 十 五 期

XUE XI YU PI 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代号: 4-192

定价: 0.25元